

---

---

# 傳承、中斷、變革與創新 —— 春秋中期前特殊青銅盤研究

蘇榮譽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

---

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是古代中國的一個鼎革階段，該時段的青銅器長期被認為處在衰頹的低點，但春秋晚期卻是新興的又一高峰，其中的歷史及其內涵缺乏研究。新發現的資料、新方法獲取的新資訊可資深入認識春秋早中期青銅藝術與技術內涵和演變。本文以青銅盤為對象，首先全面分析子仲姜盤和晉公盤的風格和技術，將其在商周青銅盤演變的大背景下進行認識，並分析其關鍵風格和技術要素的淵源關係。雖然不同時代賦予盤的功能或有不同，但這些精緻品均是鑄工率性或炫技的結果，鑄造好玩器是鑄工的一個重要旨趣，而復古也往往是變革的契機、再成為創新的途徑。鑄工的炫技可導致新的工藝發明或技術集成，他們往往是青銅藝術、技術傳承和創新的中堅，而某些風格中斷也因他們而起。西周晚期和春秋早中期青銅器，雖然有其粗糙一面，但因鑄工不甘平凡，依然鑄造了很多精品，並非過去印象的衰退低點。此外，本文還從製作角度重新認識盤的功能，並特別分析了青銅弄器與玩具等問題。

**關鍵詞：**青銅藝術 青銅技術 中斷 復古 青銅玩具

古代中國青銅器是人類藝術史和物質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是為特殊目的、以青銅為媒介、將極為獨特的藝術造詣與高超的金工技巧緊密結合的藝術傑作。

在人類文明史上，商周青銅器以造型古怪、紋飾奇幻、工藝單一但至為高超所代表的青銅時代，將古代中原文明與其他文明清楚地區別開來。古代中國青銅器的起源還不清楚，青銅時代的到來目前只能上溯到西元前十八世紀中原的二里頭文化。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頗巨規模，不僅發現了大量建築、墓葬、還發現了包括青銅鑄造的手工業作坊。遺址和墓葬中出土了一百多件青銅器，全部鑄造成形，沒能確認鍛造成形的器物，與其他文明判然有別。青銅器中，既有工具、用具、裝飾品，也有兵器和容器，而且兵器和容器的造型別致，不見於其他文明。

無論是出土的青銅器本身，還是發現的鑄銅遺址，都表明這些銅器是以泥範塊範法鑄造成形的。即使是很小僅寸許長的刀、錐和魚鈎，也是如此，不能確認使用石範鑄造它們。形狀最簡單的器具如此，形狀複雜的容器也是如此，它們可能使用了七八塊泥範和泥芯組成鑄型，澆注冷凝後獲得器物。<sup>1</sup> 雖然這些器物沒有或者只有很簡單的紋飾，但器壁薄到一、二毫米，迄今尚不能破解其中奧秘；此外，對於容器的複雜造型，在其他文明中，要麼鍛打後焊接和鉚接成器，要麼以失蠟法鑄造，但二里頭文化就是以單一的泥範塊範法工藝，鑄造了所有青銅器，為此還發明了鑄接工藝——附件分別鑄造，分先鑄和後鑄，前者先鑄附件，在澆注主體時將附件置於鑄型中，澆注後得到完整器物；後者是在鑄造的主體上組合附件的鑄型，澆注後與之結合成為一個整體。泥範塊範法奠定了中原青銅器格局，不僅成為其技術基礎和根本，也規範了青銅器的生產和組

---

1 廉海萍、譚德睿、鄭光：〈二里頭遺址鑄銅技術研究〉，《考古學報》2011年第4期，頁561-575。蘇榮譽：〈中國古代泥範塊範法青銅鑄造〉，收入氏著：《中國青銅技術與藝術（丁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13。

織。儘管諸多層面和細節都還不確定。<sup>2</sup>

二里頭文化中的青銅器興盛時代是第四期，即晚期，考古年代已經進入了商代紀年範圍。商朝建立後的考古學文化稱為二里崗期，屬早商階段，明顯地繼承和發展了二里頭文化的青銅工業和藝術，在器物種類大為增加的同時，器物向大型化和精美化兩個方向發展，前者出現了大型圓鼎和方鼎，最大可高達一米，重數十公斤；後者即鑄造紋飾，且種類在不斷增加，但最後還是以獸面紋、夔紋等統禦了基本格局，並與彩繪、填紋，偶爾也採用玉石鑲嵌裝飾器物，使之精美過人。需要強調的是，兩極化的技術基礎是塊範法及其鑄接技術，這一體系在早商得到長足發展，一些新工藝得以發明，如鑄鉚式後鑄和墊片等。<sup>3</sup>

和二里頭文化相似，早商的後段是青銅工業的高峰，但由於不明原因，遽然中斷，商王朝失都流離，經歷了五次遷徙，最後安頓在安陽洹北。在這一百多年中，王都屢遷，被概括為中商。這個階段青銅器的生產中心何在？王室青銅作坊的產品、技術、工匠均不清楚，是否流寓到長江流域也不確知。但南方的鑄銅工場似乎很繁榮，鑄造了大量南方風格青銅器，造型新穎且意趣盎然，雖多數器物的鑄造工藝相對粗糙，然其產品卻廣布各地。

武丁是一代有為帝王，將都城從洹北遷到小屯並建成大邑商，且固定在彼處長達兩百多年直至覆滅。武丁四方征伐，以獲取資源，鞏固統治。據筆者研究，他毀滅了南方鑄銅工場並將鑄工遷往大邑商，造就了殷墟青銅工業的迅速繁榮，標誌性的是武丁的一個

2 蘇榮譽：〈塊範法與中原失蠟法——春秋世變下青銅技術的本與末〉，收入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中心：《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特輯二）：中國早期數術、藝術與文化交流——李零先生七秩華誕壽慶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上冊，頁93-183。蘇榮譽：〈二里頭文化與中國早期青銅器生產的國家性初探——兼論泥範塊範法鑄造青銅器的有關問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夏商都邑與文化》（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頁342-372。蘇榮譽：〈商周青銅鑄造泥模範的七個問題〉，收入丹羽崇史編：《对照実験を主軸とした——東アジア鑄造技術史解明のための実験考古學的研究》（奈良：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2020年），頁40-59；《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頁235-244。

3 蘇榮譽：〈中國古代泥範塊範法青銅鑄造〉，頁3-13。

配偶婦好，墓中出土了數百件、重達一噸餘的精美青銅器，其中多件具有南方青銅器風格和工藝因素，確出自南方遷入鑄工之手。相應的，南方風格青銅器一蹶不振，表現出武丁時期開始了青銅容器生產的壟斷。<sup>4</sup> 從安陽業已發現的鑄銅遺址看，鑄銅規模超乎想像，空前巨大，成為都城和王國的重要經濟支柱。或許如此，商王常常駐蹕他都，朝歌即其一。考古學家認為商晚期是商文化衰退期，和大邑商工業的高度繁榮相悖，是否沒能辨識出晚商文化成為疑問。

然而，殷墟的青銅藝術，在其中期已現出衰退跡象，是否與南方鑄工及其傳人老去有關，有待考證，但明顯的事實是器物變得呆板而缺乏活力，裝飾簡化，在晚商晚期尤甚。周武王滅商建立西周，都於渭河畔的鎬京，實行宗法封建制度。繼其的成王馬上營建洛邑，將安陽工匠遷往，繼續鑄銅，洛陽北窯鑄銅遺址可與殷墟鑄銅相續接，但規模較小，持續時間也不長。<sup>5</sup> 而鎬京迄今尚未發現鑄銅遺址，所以西周青銅生產、組織和技術內涵還有諸多空白，而西周早期出現的一批奢華型青銅器，產地和淵源關係並不清楚。但西周青銅容器的生產，似乎表現出更強的壟斷性，成為王室與諸侯及其臣屬聯繫的重要紐帶和方式。從出土和傳世的大量西周青銅器看，它們繼承和延續了晚商風格，雖在西周中期儘管有新型式出現，但都死板呆滯，紋飾逐步失去母題而變得平面、機械、僵硬和裝飾化，其閃亮點似乎在於鑄造長篇銘文，許多青銅盤成為銘文的載體。

西周社會的內外矛盾終於招致了覆滅。平王在幾位諸侯護送下遷往洛邑，歷史進入東周時代，也稱春秋時期。從此，周室日益衰微，周王蝸居在方圓二百里京畿內，諸侯不予納貢，王室困頓，似乎也沒有能力繼續鑄造青銅器。相反，一些諸侯做大，先後稱霸天

4 蘇榮譽：〈婦好墓青銅器與南方影響——殷墟青銅藝術與技術的南方來源與技術選擇新探〉，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承真樓編：《商周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頁1-68。

5 Su Rongyu, "Rethinking Beiyao Foundry Site of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at Luoyang," *Making Economy: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Good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5-771 B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April 1-3, 2022).

下，挾天子以令諸侯，想必鑄銅也會成為諸侯競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遺憾的是不僅沒有任何文獻涉及於此，也尚且沒有屬於春秋前期具有生產規模的鑄銅遺址被發現。

但是，春秋晚期侯馬晉國鑄銅遺址的發現和發掘，揭示出諸侯大國驚人的青銅器生產能力和水平，在其他諸侯國的發現，數量少而規模小，遠遠難以匹敵。這一格局表明，儘管春秋時期王室對青銅容器的生產壟斷被打破，但有能力鑄造青銅容器的依然不多，青銅器在中原社會中的角色和作用，還沒法被清楚認識。但明確的事實是，侯馬鑄銅的繁榮大約也就一百來年光景，遂即晉國諸卿做大，韓、魏、趙三家分晉，侯馬鑄銅似乎也迅即崩塌，歷史進入了戰國時代。而關於戰國時代的青銅容器生產格局，目前更不清楚。秦帝國短祚，青銅器生產可能集中在中央。漢代皇室、國家和某些郡國都鑄造青銅器，到西漢中期，青銅容器快速衰落，長達一千六百年的青銅禮樂器生產，走向式微。

面對早期中國青銅器的發展，頗多學者進行階段劃分和概括。1945年，郭沫若（1892–1978）據當時的材料，將青銅器分為鼎盛期（殷至西周穆王）、頹敗期（西周恭王至春秋中葉）、中興期（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和衰落期（戰國末之後）。<sup>6</sup>五十年後，蘇榮譽等結合青銅工藝，將青銅器的發展分兩階段六個時期，前五個時期包括草創期（史前時代）、形成期（二里頭文化）、勃發期（二里崗時期）、鼎盛期（殷墟至西周早期）和滯延期（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都屬於古典階段，後接新興階段包括新興期（春秋晚期至戰國晚期）。<sup>7</sup>學界共同認為西周中晚期到春秋中期青銅藝術和技術處在頹勢中。<sup>8</sup>

6 郭沫若：〈青銅時代〉，收入氏著：《青銅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頁297–308。

7 蘇榮譽等：《中國上古金屬技術》（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頁95–179，371–373。

8 張世賢：〈試論中國銅器的製作在西周自鼎盛轉衰頹的緣由——兼論中國開始使用硫化礦煉銅的年代〉，《第一屆科學史研討會集刊》（《科學史通訊》1987年第5期附刊），頁18–28。近三十多年的發現和研究，對張氏的論據已有很大的修改，將另外為文討論。

很明顯，深刻認識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青銅器及其製作技術，分析從傳統階段到新興階段的轉變機制、內容和方式，是中國青銅器研究不可忽視的問題。近三十年田野考古發現了大批這一階段的青銅器，它們的藝術和技術內涵均頗為豐富，可重新思考這一階段青銅器的格局和面貌。對於春秋晚期青銅技術和生產格局的變革，筆者已經獻拙。<sup>9</sup> 現將目光聚焦在春秋早、中期，大型器群的研究要假以時日，本文試圖通過解析春秋中期晉公盤和春秋早期子仲姜盤的風格和工藝因素，並對二器進行對比，在青銅盤發展演變背景下，在梳理重要裝飾因素源流的基礎上，剖析和認識青銅盤造型、紋飾和附飾演變的機制，分析其動因並認識鑄工的作用，藉以思考春秋早中期社會變革時代的青銅藝術和技術格局與取向，並對某些器物的功能進行重新認識。

## 一、晉公盤與子仲姜盤

這兩件盤分別是春秋早、中期青銅器中的奇葩，且聯繫緊密。可惜均非考古發掘品，失去了考古背景。

### （一）晉公盤

晉公盤是一件公安機關收繳、收藏於山西博物院暨山西青銅博物館的珍品，是迄今所見春秋中期裝飾最為複雜的器物（圖 1.1-2）。通高 117、通寬 450、口徑 400 毫米，重 7,000 克。<sup>10</sup> 淺腹，寬斜沿，方唇。腹壁外飾龍紋帶；兩側對設拱形附耳，其前後面飾以重環紋，耳廓裡面有短橫梁接於唇（圖 1.3）。平底，三隻跽跪人形足以後肩承器。腹內壁鑄七塊銘文（圖 1.4）與浮雕魚文（圖 1.5）。內底滿布紋飾和附飾，紋飾為浮雕型，包括中心的兩條盤龍、中圈的游水鯢（圖 1.6）和外圈的游水蛙；附飾均為圓雕型，包括中央的

9 蘇榮譽：〈塊範法與中原失蠟法——春秋世變下青銅技術的本與末〉，頁 93-183。

10 山西省公安廳、山西省文物局：《國寶回家——2018 年山西公安機關打擊文物犯罪成果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年），頁 18-23。



圖 1.1 晉公盤（本文除特殊注明來源者外均為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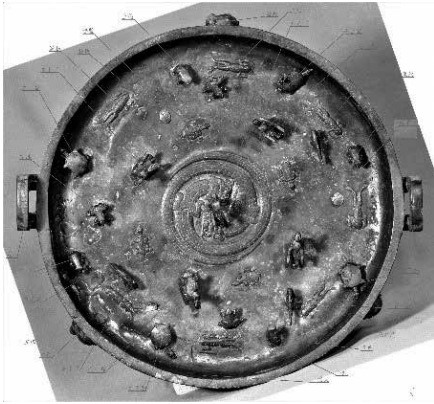


圖 1.2 晉公盤底及裝飾標識



圖 1.3 晉公盤左耳側面



圖 1.4 晉公盤銘文第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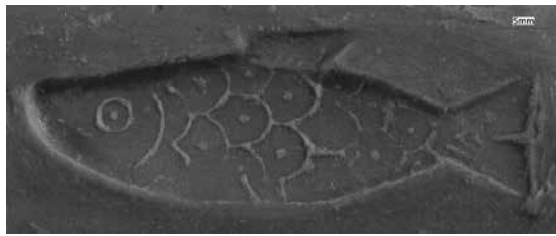


圖 1.5 晉公盤腹內浮雕魚飾



圖 1.6 晉公盤底面浮雕游水繫飾

一隻鳥（圖 1.7）、內圈的四隻鳥（圖 1.8）、中圈相間分布的三隻魚（圖 1.9）和三隻蛙（圖 1.10）、外圈相間分布的四隻鯢（圖 1.11）和四隻蟾（圖 1.12）。這些圓雕動物都伏在立柱之上，均可繞柱旋轉；內圈鳥的喙可開閉，外圈鯢的頭可伸縮和擺動；其中魚和蛙各脫失一隻，但沒有補鑄完整，鑄封了脫失所形成的柱洞。



圖 1.7 晉公盤底中心圓雕鳥飾側面



圖 1.8 晉公盤內圓雕鳥飾（左上）



圖 1.9 晉公盤內圓雕魚飾（右下）



圖 1.10 晉公盤內圓雕蛙飾（上蛙）



圖 1.11 晉公盤內圓雕鯢飾（左上）



圖 1.12 晉公盤內圓雕蟾蜍飾（左）



腹內壁鑄七塊、計 183 字銘文的做法罕見，銘可韻讀。開篇稱頌先祖先考功績，其中不乏套話；中間自述事業，可比祖先懿行勳勞；最後指出作元女孟姬宗彝盤，告誡祝福。先考為晉獻公，作器者為獻公之子，當為晉文公重耳。長女孟姬遠嫁楚國為宗婦，即為君妃，鑄造此盤為媵器，稱之為宗彝盤。盤應鑄造於晉文公即位初期，大約城濮之戰（文公五年，前 636）之前。<sup>11</sup>

為清楚認識該盤的內在結構，採用 X 光 CT 掃描技術分析該盤。確認盤的雙耳先鑄，中空，且其中泥芯分兩段拼合。<sup>12</sup> 耳在澆注盤時與盤腹鑄接，耳根兩個結合點與兩個短橫梁的結合點使耳與盤鑄接牢固（圖 1.13）。三足分鑄，則是以鑄焊方式與盤連接的（圖 1.14），可能在人後背的雙手之上澆注青銅完成鑄焊。內底的圓雕動物均有立柱，二者是套合關係，柱頭設有凸輪防止動物與柱分離，柱頭或呈錐形（圖 1.15–17）、或為蘑菇形（圖 1.18–20），均與動物脊內相應的卯配合，一則保持動物身體平衡，二則減小摩擦力，動物可繞柱靈活旋轉。立柱與盤底並非直接結合，中間還有一個過渡層。這一過渡層大體包圍了立柱下端，形成圓形或方形塊，而立柱往往偏向一邊（見圖 1.16）；這塊在盤內底面可以看到，與盤有清晰的分層或分界，甚至高出底面（見圖 1.9）或者漫漶在底面形成不規則塊（見圖 1.12），但在盤外底則不然，大多只出露一部分，個別則完全不出露（圖 1.21–22）。柱與盤以鑄焊結合，過渡層正好是焊料，也是青銅，所以鑄焊屬大焊（*braze welding*）。在先鑄的盤上設計並完成所有工藝孔，多為方形，少量圓形，且基本上屬內大外小的漏斗狀。同時鑄造立柱、製作圓雕動物的鑄型，並將立柱包含在動物的腹部泥芯中，澆注後動物與立柱完成套接，動物可以繞立柱轉動並不會從立柱脫開。然後，逐一將立柱插入工藝孔中，盤內側當然有泥範包含並固定立柱和動物並緊貼內壁，外面也有緊貼

11 管文韜：〈試論晉公盤銘文及相關問題〉，《青銅器與金文》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頁 94–122。

12 丁忠明、蘇榮譽：〈晉公盤的鑄造工藝分析〉，《文物季刊》待刊。晉公盤的 CT 掃描結果和本文關於晉公盤的鑄造工藝資料即本於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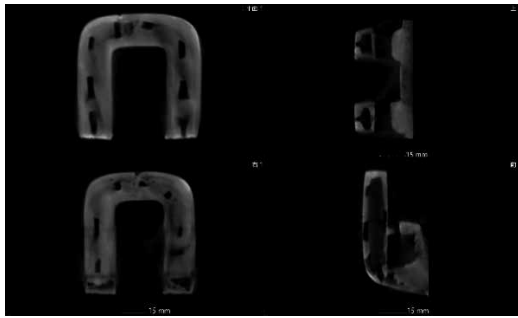


圖 1.13 右耳泥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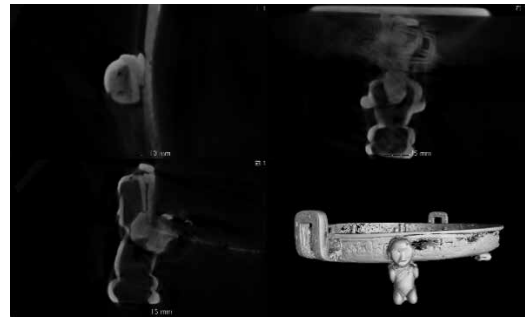


圖 1.14 左足 CT 四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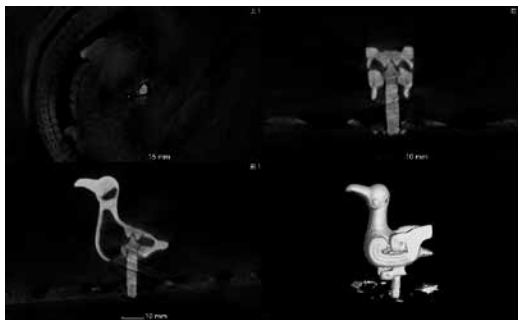


圖 1.15 中心圓雕鳥 CT 圖



圖 1.16 左上鳥 CT 四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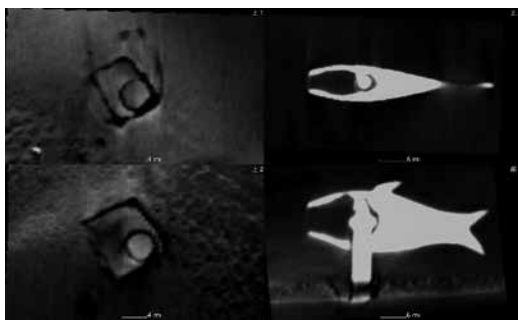


圖 1.17 右上魚圓柱與盤底截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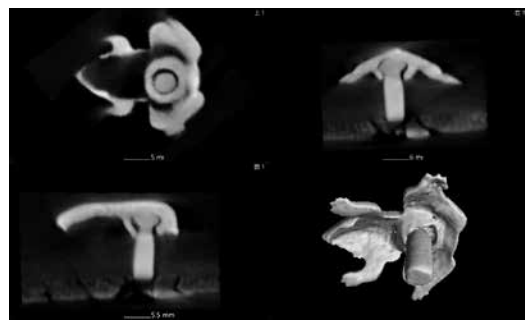


圖 1.18 左蛙 CT 四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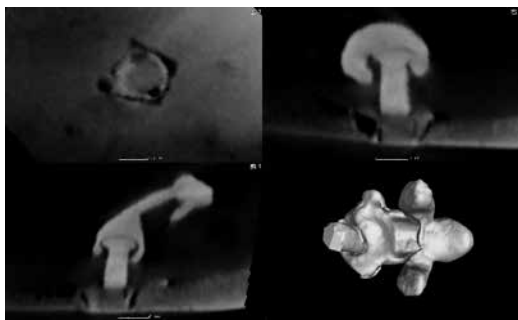


圖 1.19 右蟾 CT 四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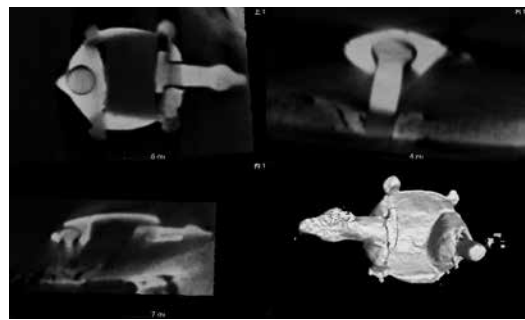


圖 1.20 右後蟾 CT 四視圖



圖 1.21 晉公盤外底



圖 1.22 晉公盤底部 CT 截面圖



圖 1.23 盤底補塊 585A1417



圖 1.24 銘文中補塊

外底的澆注系統可將熔融的青銅導入工藝孔中，澆注冷凝後即完成鑄焊。若盤內範與盤有裂隙，熔融的青銅會漫入，在盤內形成不規則補塊形貌，盤外底依然。這樣繁瑣的多工序操作，易於出錯產生缺陷。

盤的鑄造缺陷的確很多，首先是盤底的圓雕附飾脫失一條魚和一隻蛙，並在盤底產生柱洞，應是鑄接或者焊接不夠牢固造成，但鑄工並沒有焊接它們，或者另行鑄造魚和蛙並將它們的立柱焊接於盤底，而是直接澆注青銅封閉了柱洞。因為材質相同，推定脫失是在製作過程中發生。或者是嫁期太緊沒時間補救完整，或者鑄工已足夠滿意這次品亦是極品。但從盤底和盤壁多處補塊看（圖 1.23–24），雖然設計匠心很高，但實際鑄造的工藝水平難以達到，頗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儘管是一件極致之品。

## （二）子仲姜盤

子仲姜盤是葉肇夫捐贈給上海博物館的一件珍品（圖 2.1–2），通高 180、口徑 450 毫米，重 13,400 克。淺腹，寬平沿，方唇，腹外飾獸體紋帶；平底下矮圈足飾重環紋帶，圈足側附以三個走姿虎形足承器（圖 2.3）。腹壁對設拱形附耳，耳裡、外面均飾重環紋，內側設短橫梁與唇相接（圖 2.4）。與雙耳相對的腹外壁對設兩爬龍，口銜盤沿，眼珠突出，雙耳側張，一對 S 形角伸向兩側（圖 2.5）。腹內壁光素，內底不僅飾浮雕魚（圖 2.6）、游水蛙和鱉（圖 2.7–8），更有四組圓雕附飾：中心飾一圓雕鳥（圖 2.9），內圈設四條圓雕魚（圖 2.10），中圈飾四隻圓雕鳥（圖 2.11），外圈飾四隻圓雕蛙（圖 2.12），這些圓雕附飾伏在圓柱上並均可繞柱旋轉。

盤底鑄銘六行三十二字（圖 2.13），馬承源根據銘文並結合器物風格，將其斷為春秋早期，係晉太師為仲姜作器。<sup>13</sup>

經對此盤進行 CT 掃描分析，除盤的雙耳渾鑄外，其餘均分鑄

13 馬承源：〈跋子仲姜盤〉，收入馬承原著，陳佩芬、陳識吾編：《馬承源文博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66–168。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博物館藏品（東周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82–85。



圖 2.1 子仲姜盤



圖 2.4 子仲姜盤耳內壁與短橫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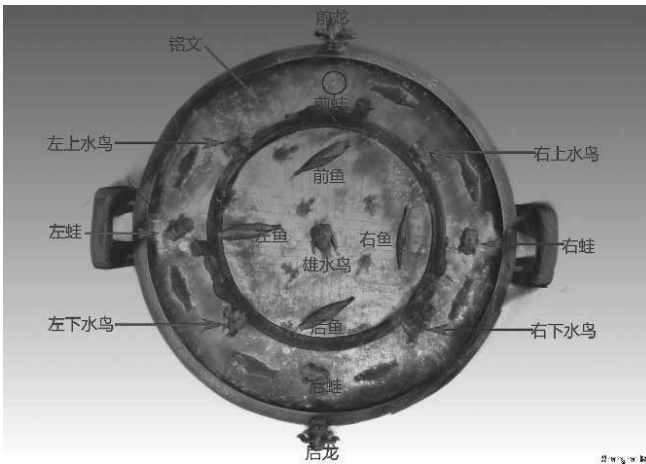


圖 2.2 子仲姜盤內裝飾



圖 2.5 子仲姜盤外壁爬龍飾



圖 2.3 子仲姜盤虎形足



圖 2.6 子仲姜盤腹內壁浮雕魚



圖 2.7 子仲姜盤底面浮雕游水鯢飾



圖 2.8 子仲姜盤底面游水蛙飾拓片（引自《夏商周青銅器研究（東周篇）》頁 85）



圖 2.9 子仲姜盤底中心圓雕鳥飾



圖 2.10 子仲姜盤底面圓雕魚飾



圖 2.11 子仲姜盤底面圓雕鳥飾



圖 2.12 子仲姜盤底面圓雕蛙飾



圖 2.13 子仲姜盤銘文拓片



圖 2.14 子仲姜盤尖錐立柱的 CT 渲染圖



圖 2.16 子仲姜盤蘑菇柱頭渲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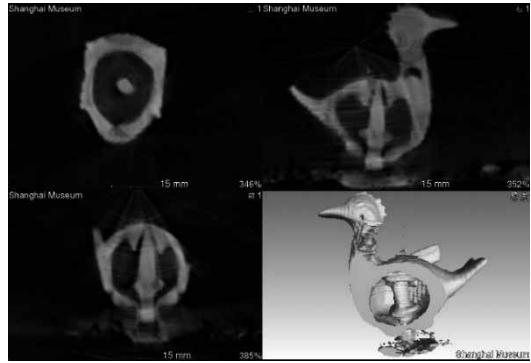


圖 2.15 子仲姜盤中心鳥 CT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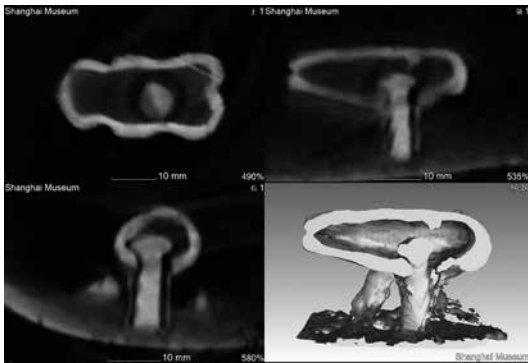


圖 2.17 子仲姜盤後蛙 CT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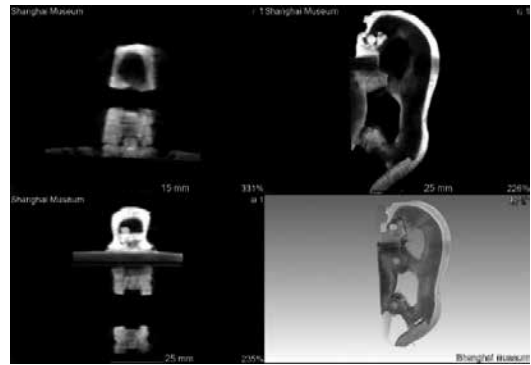


圖 2.18 子仲姜盤後爬龍 CT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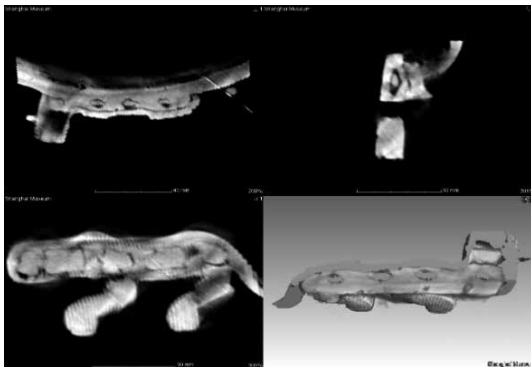


圖 2.19 子仲姜盤前虎足 CT 圖



圖 2.20 子仲姜盤底部 CT 二維成像



圖 2.21 子仲姜盤圈足澆口



圖 2.22 子仲姜盤外底及其冒口

鑄接成形。首先鑄造兩類立柱，一類柱頭為圓錐體（圖 2.14），並在中部設有直徑較大凸輪，用於防止圓雕水生物脫落，盤中心鳥、周圍四鳥和四魚採用這樣的立柱，鳥背內和魚背內設錐形卯與之配合（圖 2.15）；另一類柱頭為蘑菇狀（圖 2.16），圓雕蛙採用它，背內設與之配合的臼（圖 2.16）。立柱先鑄，在柱頭塗覆一層薄泥，包含在圓雕動物的泥芯中，鑄後二者套接在一起。

盤腹壁的攀龍，在龍口內和前、後雙足之間均設橫圓柱，便於攀龍與盤體鑄接牢固（圖 2.18）。先鑄的虎形足體內空，內側設四個間距相等的金屬欄，鑄接時青銅液注入虎體，與金屬欄形成榫卯結構（圖 2.19），強化連接。先鑄的虎形足和盤內附飾，分別安置在盤的泥範和泥芯中，接榫伸入型腔，並安放墊片（圖 2.20），澆注盤體時，一次實現鑄接。盤體鑄型倒置澆注，圈足上遺存有打掉澆道的斷茬（圖 2.21），外底中心可能還設有冒口（圖 2.22）。<sup>14</sup>

### （三）晉公盤與子仲姜盤對比

子仲姜盤屬於春秋早期器，晉公盤是春秋中期作品，二者相差百來年，各自有其時代特徵，但更重要的是二者的聯繫。子仲姜盤腹壁飾寬大變體獸紋帶、圈足飾垂鱗紋帶、耳內外面飾重環紋，都是西周晚期、兩周之際到春秋早期的典型紋樣，自西周中期獸面紋退化後，這類變體獸紋、竊曲紋、重環紋、環帶紋、瓦稜紋和垂鱗紋成為

14 丁忠明、周亞、吳來明：〈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X-CT)在子仲姜盤製作工藝研究中的應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7年第5期，頁12-25。





圖 3 事從盤（引自 *Bronzes Archaiques de Chine*, p.149）

主要紋飾，另有交龍紋等，紋飾基本失去了母題而只具有裝飾性，紋線寬大如帶。但在春秋中期，紋樣開始了變化，紋線開始變窄、變細，龍紋再趨活躍，晉公盤腹壁的紋帶具有典型性，其耳內外面的重環紋，仍是早期階段的延續，體現了變革時期的紋飾特點。

從器形看，子仲姜盤大口，腹略深，寬平沿，厚方唇，腹壁兩側對設拱形附耳，圈足外撇，都是西周時代典型造型，至於盤腹外的爬龍飾，淵源可能要追溯到巴黎基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收藏的西周早期事從盤（編號：AA51，圖 3），典型的西周早期盤形，腹壁外對設兩爬龍耳。<sup>15</sup> 但似乎是鑄工的率性而為，西周早期為孤例，西周中期亦未見，直到西周晚期，在晉穆侯墓出土的晉叔友父盤中以另一種形態出現（詳見下文），也是那時某個鑄工試圖鑄造華麗器形的努力，在春秋早期更多作為匜的鑿而延續。子仲姜盤恰是稀見之品。而圈足附動物形足承器，也是兩周之際的新風氣，器物不多，下文會涉及。相對而言，晉公盤腹外基本無附飾，雙耳依然是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的形式，但不設圈足，則是春秋早期新出現、春秋中期開始流行的類型。這類盤多以三蹄足承器，晉公盤採用三跽跪人為足，是移借了西周時期青銅盒的設計，在春秋時期，

15 Maud Girard-Geslan, *Bronzes Archaiques de Chine* (Paris: Tresors du Musée Guimet, 1995), 148-51. 事從盤通高 100、口徑 380 毫米。

有數件器具有人形足，內涵頗為複雜，將另外為文討論。

兩件盤的最不尋常之處在於盤內底的浮雕和圓雕附飾，二者的最大聯繫也在於此。浮雕附飾的魚、鰲、蛙都一致，圓雕附飾更有其妙。子仲姜盤內底裝飾五隻鳥、四條魚、四隻蛙，晉公盤裝飾五隻鳥、三條魚、三隻蛙、四隻鰲和四隻蟾（魚與蛙原本各四，各脫失一），它們造型一致，紋飾高度接近，鑄造工藝相同，均伏在立柱上，柱頭插入動物腹中，動物可以繞柱轉動。為防止動物脫開失卻，柱端設計有凸輪，直徑大於柱與動物的配合孔。為使動物身體平衡並轉動靈活，柱頭設計成錐形，而鳥和魚背內設計相應的白卯與之配合。更為特別的是，晉公盤蛙、鰲和蟾的立柱柱頭為蘑菇形大頭，動物背內壁設計收口的白卯，口小於蘑菇頭防止脫開，白卯與蘑菇頭配合間隙很小。而子仲姜盤蛙的柱頭也是蘑菇形，只是背內側沒有設置白卯與之配合而已，但下腹的柱孔直徑小於蘑菇頭，同樣具有防止脫開的功效。二者微小的差別反映了時代的不同，體現晉公盤對子仲姜盤的改進，精妙得驚人。錐形柱頭與其動物，一致得簡直就是平移。

然而，較大的不同在立柱與盤的連接上。子仲姜盤採用直接鑄接，這是延續二里頭發明的鑄接工藝的做法，CT 掃描圖像顯示出鑄接品質頗高。但晉公盤則別出心裁，採用鑄焊法。晉公盤上的鑄造缺陷和補鑄，反映出其中的實際技藝不如子仲姜盤的鑄工。<sup>16</sup>

兩件盤相比，子仲姜盤不僅有圈足，盤壁有一對造型華麗的爬龍，口含唇，窺視盤中諸多可以轉動的動物，內外結合且均衡，外靜內動相統一。晉公盤明顯著眼於盤內，盤底布局了很多浮雕和圓雕動物，集成了盤的所有裝飾形式和要素，以至長達 183 字的長篇銘文只能鑄在腹內壁，也只能分七段安排。其重視盤內裝飾的理念，有若中商階段開始、並在晚商早期臻於極致的盤內裝飾紋飾的理念在春秋早中期的一種昇華。

晉公盤和子仲姜盤是具有鮮明時代特色、同時具有緊密聯繫的兩件盤，有若兩代鑄工產品，難以想像會相差百年，所以它們應出

16 丁忠明、蘇榮譽：〈晉公盤的鑄造工藝分析〉，待刊。

自同一鑄造世家。百年通常會歷經四代人，在對商代鑄鉚式鑄接約兩百年工匠譜系的排比中，產品經歷了多種變易，<sup>17</sup> 有理由期待介乎兩盤之間的盤和類似裝飾的其他青銅器的發現。

涉及到盤的功能，據銘文，子仲姜盤是太師為仲姜鑄器，晉公盤乃晉文公為孟姬鑄器，都是父親為女兒鑄器，<sup>18</sup> 晉公盤為媵器而子仲姜盤未言及，不無媵器的可能。如此豪華的媵器，充分體現女方對一門婚姻格外珍重，也反映女方雄厚的實力。雖然子仲姜盤銘為「沫盤」，即「盥盤」，晉公盤稱「宗彝盤」，但從它們華麗機巧的裝飾看，兩器都不夠莊嚴，亦不適用於承接典儀盥洗的廢水，但注入水後，晃動盤既可使水中圓雕動物繞柱旋轉，也使浮雕或平鋪動物若隱若現，所以均是玩具，對此，下文有一節討論。

## 二、早期青銅盤的格局與型式演變

盤在當今是很普通平常的日用器具，一種大口、淺腹的容器，或大或小，人人皆有，人人可用。但在中國早期卻並非如此。在青銅時代之前的陶寺文化遺址，已經出現了若干紋飾華麗、僅用於陪葬大墓的彩繪陶器。而且不像其他彩繪陶器和漆木器成批成組隨葬，每墓僅隨葬一件。這些彩繪陶盤造型和彩繪紋樣高度一致，均是口銜長穗的盤龍，彩繪完好，沒有使用痕跡，明顯屬於特製的葬器或禮器而非實用器。<sup>19</sup> 以下試對商周青銅盤的格局與型式略作梳理，便於認識子仲姜盤和晉公盤的設計定位。

17 蘇榮譽：〈安陽殷墟青銅技術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鉚結構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博古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收入泉屋博古館、九州國立博物館編：《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頁352-386。

18 周亞、丁忠明、蘇榮譽：〈子仲姜盤與晉公盤對比研究：以鑄造技術為核心〉，待刊。

19 陶寺彩繪陶盤的實例，不能贊同巫鴻的意見，認為禮器是「通過用貴重材料模仿平常物品以創作出禮儀美術的作品」；見氏著，李清泉、鄭岩等譯：《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91，特殊圖案和平凡的載體同樣可以成為「禮儀美術品」。

### (一) 早商

最早的青銅盤出現在早商的二里崗上層，鄭州商城和黃陂盤龍城各出土兩件，除一件出自窖藏外，其他三件均出自當時最大的墓葬，且每墓也只有一件，均屬二里崗上層階段。這種格局與陶寺文化彩繪陶盤相一致，雖然盤所蘊含的象徵意義還不確知。二者的相似性是否意味着二里崗的青銅盤內壁也有彩繪也成疑問。另有兩件



圖 4.1 盤龍城李家嘴盤 LZM2:1



圖 4.2 李家嘴盤 LZM2:1 腹部紋飾與鑄造披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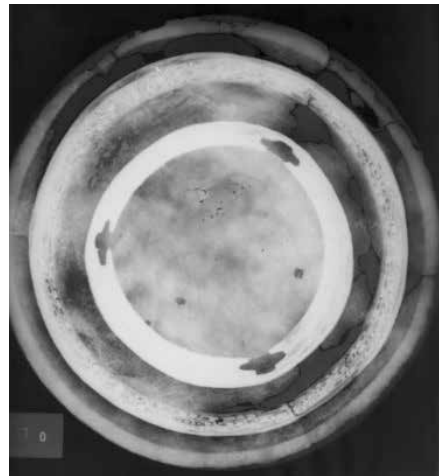


圖 4.3 李家嘴盤 LZM2:1X 光片

分別出自城固龍頭火疙瘩窖藏和河南新鄭望京樓一座墓葬，後者資訊缺失很多。<sup>20</sup>

在二里崗上層時期，或許是青銅盤尚處在定形階段，盤的類型和紋飾互有出入，尺寸變化較大，直徑從鄭州向陽回民食品廠窖藏盤的 490 毫米到盤龍城李家嘴一號墓盤的 264 毫米。但從尺寸看，盤不是個人飲食用的餐具，符合《方言》「般（盤），大也」的訓釋，但對其用途則一無所知。同時，由於缺乏研究，盤的一些工藝現象還不能夠確定。鄭州向陽回民食品廠殘盤和白家莊盤可能對開分型，其他盤的鑄造工藝則基本一致，以三塊腹範與一塊腹芯和一块圈足芯組成鑄型，澆注成形。

盤龍城李家嘴二號墓盤 LZM2：1 可以代表二里崗晚期青銅盤的主流，敞口、寬折沿、薄唇，外弧腹壁飾紋帶，下腹內收出平底或微圓底（圖 4.1-3）。下接直徑不大的圈足，圈足頂上一周往往設透孔，多是三個，足壁多飾一周凸弦紋。鑄型基本三分，只有極個別例外。

## （二）中商

中商是早商二里崗期和晚商殷墟期的過渡階段，是文獻所記屢次遷徙的動亂年代，鑄銅工業的中心至今不明，僅能辨識出南方風格青銅器鑄造於長江中游，具體地區尚無頭緒，且不能確定南方作坊是否鑄造青銅盤及怎樣鑄盤。

中商時代的青銅盤可以城固龍頭火疙瘩第一次窖藏出土者為代

20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第 10 期，頁 24-42，插圖 2，圖版 1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市博物館：〈鄭州新發現商代窖藏青銅器〉，《文物》1983 年第 3 期，頁 49-59，圖 17.3、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9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頁 822，圖 554.1-3，圖版 231.1-2，彩版 38.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頁 152-157、175-176，圖 100、116.3-4，圖版 49.4，彩版 17.2；第 181、199 頁，圖 116、138.5，圖版 49.4、60.3，彩版 17.2。



圖 5.1 城固龍頭火炆痞盤（引自《漢中出土時代青銅器》頁 159）



圖 5.2 龍頭火炆痞盤內壁（引自《漢中出土時代青銅器》頁 159）



圖 5.3 石樓桃花者盤（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4 圖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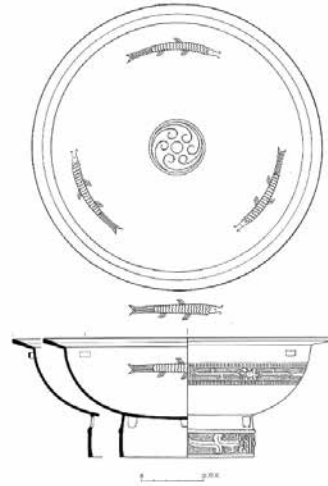


圖 5.4 石樓桃花者盤（引自《晉西時代青銅器》頁 288）

表。<sup>21</sup> 寬斜折沿，使口更敞；薄唇，淺腹，腹壁向外弧鼓，飾一周窄細陽線斜角雲紋帶；底微圓，底面飾細線渦紋，其周邊鑲圓圈紋環。圈足壁微外斜，頂面均布三個橫置的長方形透孔，孔之下的器壁加厚（圖 5.1-2）。顯著特徵是盤內底的紋飾，一個圓渦紋外周環以圓圈紋。類似的一件出土於安陽武官村被盜掘的一座墓中（盤 M259:4），底面的圓渦紋外只有細環線，內壁還均布飾三條魚紋。<sup>22</sup>

21 王壽芝：〈陝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1988 年第 6 期，頁 3-9，圖 7-8。曹璋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第二卷，頁 157-158。

2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 259、260 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7 年第 1 期，頁 99-117，圖 17.1、圖版 13.3。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1998 年），第三卷，圖 170-171。

然而，這一時期大多數青銅盤內底裝飾龜鱉紋，有的也在其外環以圓圈紋，但內壁幾乎都有三條魚紋，龜鱉紋與魚紋形成固定搭配，說明龜鱉紋與圓渦紋具有某種互換性，渦紋與水有關。盤的圈足往往在透孔之下裝飾紋帶，不少是斜角目紋。它們構成中商青銅盤的裝飾格局。這類盤較多出現在晉陝高原，如山西石樓桃花者（圖 5.3-4），陝西清澗張家坵、解家溝和棗林坪，這些器物雖然成組出土，但多非科學發掘，資訊完整性可疑，盤各一件，而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出土兩件，頗為稀奇。<sup>23</sup>

### （三）晚商與西周早期

晚商以武丁遷都安陽小屯為開端，直至西周滅商，歷時二百多年。武丁征伐四方，毀卻南方鑄銅工廠並將鑄工遷往都城大邑商，成就了鑄銅工業的迅速繁榮、臻於鼎盛。<sup>24</sup> 殷墟婦好墓出土青銅器，既有個別中商時期器物，但絕大多數體現了這一躍遷式發展的結果。墓中出土兩件青銅盤，一件婦好盤 M5:777 應當是婦好自作器，敞口，窄沿，方唇，淺腹，腹外飾夔鳥紋帶等。底微圓，下接高圈足，圈足頂的長方形透孔有的被封閉。圈足外壁外飾獸面紋帶。腹內壁一周紋飾不清，一組似為鳥、魚和獸紋；盤底面飾盤龍一條，龍頭的左右分別鑄銘「婦好」，旁有夔紋和獸紋（圖 6.1）。<sup>25</sup> 另一件青銅盤 M5:853 也敞口，寬折沿外出，腹壁外平鋪一周斜角雲紋帶，上、下以突弦紋鑲邊。圓底，底面飾一條蜷曲成團的蟠龍紋，龍頭左上側飾一獸紋，右側飾兩條魚紋。圈足壁微外斜，頂面

- 23 謝青山、楊紹舜：〈山西呂梁縣石樓鎮又發現青銅器〉，《文物》1960年第7期，頁51-52，50。韓炳華：《晉西商代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287-292。《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四卷，圖175。蘇榮譽：〈商前期青銅盤研究〉，《故宮學術季刊》，即刊。
- 24 蘇榮譽：〈婦好墓青銅器與南方影響——殷墟青銅藝術與技術的南方來源與技術選擇新探〉，頁1-68。
- 2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頁92，圖版61.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圖23.1。《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三卷，圖167。



圖 6.1 婦好盤 M5:777 (引自《殷墟青銅器》  
圖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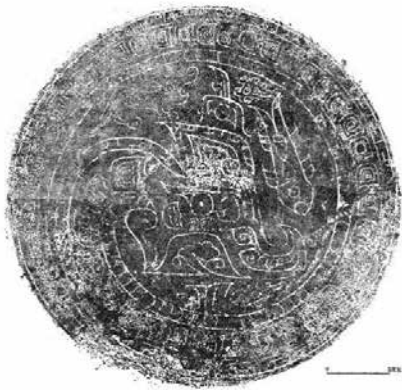


圖 6.3 婦好盤 M5.853 內網底飾拓本 (引自  
《殷墟婦好墓》頁 33)



圖 6.2 婦好墓盤 M5.853 (引自《殷墟婦好墓》  
圖版 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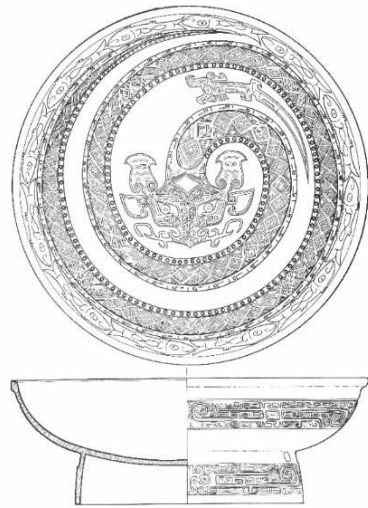


圖 6.4 安陽小屯蟠龍紋盤 M18:14 (引自  
《殷墟青銅器》圖 56)

均布兩對透孔，兩個已被鏽塞閉；下段平鋪獸面紋帶（圖 6.2-3）。<sup>26</sup>

安陽小屯還出土了一件與婦好盤相同風格的青銅盤 M18:14（圖 6.4），推測墓主也是王室成員，年代也屬殷墟早期。<sup>27</sup> 上述三件盤應代表了殷墟早期高等級青銅盤的風格，盤內滿布細密而規矩的紋飾，底飾盤龍紋，腹內壁往往飾魚、鳥和獸紋帶。

2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頁 92，圖 21，圖版 62.2。

2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小屯村北的兩座殷代墓〉，《考古學報》1981 年第 4 期，頁 491-518，圖 9，圖版 13.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圖 56。



殷墟早期很大程度上由於南方鑄工的遷入造就青銅藝術和技術的躍升和青銅工業臻於鼎盛，但並沒有持續太久，在殷墟中期藝術上已經顯現出衰退跡象，在青銅盤的紋飾上表現得很明顯。如 1990 年發掘的安陽郭家莊 M160，年代屬於殷墟中、晚期之交，墓主可能是址族首領。墓中出土青銅器 291 件，其中禮樂器四十四件，包括亞址盤 M160:97。盤有寬斜沿，方唇，外弧腹壁內收出圈底，下接高圈足。腹外鱗紋帶上均布三個高浮雕犧首，圈足較細，飾夔紋帶，兩紋帶均以 I、T 相間的窄帶鑲邊，以細密雲雷紋襯底。圈足頂無透孔，下段直折出立裙。<sup>28</sup> 盤外紋飾與前述早期盤差別不大，但盤內紋飾消失，只有兩字銘文「亞址」（圖 7.1）。



圖 7.1 亞址盤 M160.97 附銘（引自《殷墟新出土青銅器》頁 276-277）

1999 年發掘的安陽劉家莊北 M1046，年代被斷為晚商晚期帝辛階段，墓主為高級貴族。墓中出土 123 件青銅器，其中容器三十三，包括盤 M1046:8。腹部所飾夔紋帶上也有三個高浮雕犧首，並以雲雷紋襯底，但紋帶無鑲邊，圈足僅飾兩道凸弦紋，內底鑄銘「亞卣」。<sup>29</sup> 較之亞址盤，又簡化了一層。

2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1992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頁 70、77-78、103-10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276-277。

2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劉家莊北 1046 號墓〉，《考古學集刊》第十五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頁 359-388。

武王滅商並沒有改變殷商青銅器的基本格局，而是延續殷商晚期的做法。陝西寶雞竹園溝強季墓是與夫人合葬墓，年代屬西周早期，出土兩組二十三件青銅禮器，強季組禮器十六件，包括季作盤 BZM4:7。盤敞口、淺腹，窄平沿，圓唇，外弧腹壁飾斜角目紋帶，下腹對置附耳，耳頂不過口沿，圈足上端徑小，內弧足壁飾兩周凸弦紋，足下段外撇並直折出立裙。盤內無飾，底中鑄銘三字「季作寶」（圖 7.2）。出土時青銅壺 BZM4:8 置於盤內，反映二者的組合關係。<sup>30</sup> 季作盤在延續晚商型式的基礎上，移借了商代青銅盂的雙耳，開啟了中商青銅盤的新型式。郭寶鈞（1893–1971）將盤、盂、盆、盥歸為一類，<sup>31</sup> 頗具內在聯繫，富有見地。陝西長安花園村墓葬出土的西周康王時期青銅公盤 M17:42，平沿，厚方唇，腹外氏一周浮雕蟬紋，雲雷紋襯底，大圈足，附耳，盤內鑄銘「公作寶尊彝」。目紋與同出的公盃 M17:40 相同，成組。<sup>32</sup> 也是具有附耳新風格的早期實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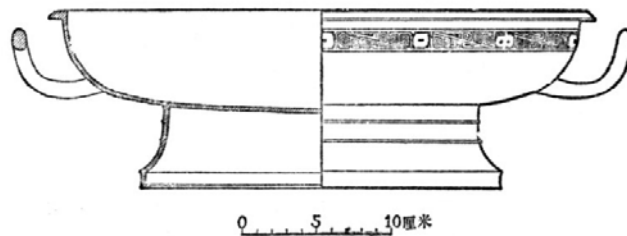


圖 7.2 季作盤 BZM4:7（引自《寶雞國墓地》圖 119.2）

很明顯，晚商到西周早期青銅盤，分為晚商早中期的繁麗裝飾階段和中晚期到西周早期的簡樸階段，最大差別在於前一階段盤內裝飾紋樣，後一階段光素，而且開始出現附耳。雖有這樣的風格變

- 30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強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 141–145、158，圖 119.2，圖版 75.4。蘇榮譽：〈從強國銅器看西周早期青銅冶鑄技術對殷商的繼承和發展〉，收入氏著：《磨戟——蘇榮譽自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 117–140。
- 31 郭寶鈞：〈古器釋名〉，收入《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頁 689–708。
- 32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周鎬京附近部分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 1 期，頁 1–31，圖 35，圖版 2.1。

化，但其稀缺性沒有改變，只隨葬高等級墓葬，除婦好墓外，一墓只隨葬一件。

陝西涇陽高家堡西周早期墓地中，M1 和 M4 各出土一件青銅盤。盤 M1:13 接近季作盤，而 M4:15 頗特別，敞口、淺腹，平沿、厚方唇；外弧附壁飾神面紋帶，其上均布三個高浮雕犧首，高圈足外飾目紋與渦紋相間紋帶，都以細密雲雷紋襯底。內壁無紋飾，但外底飾陽線盤龍紋（圖 7.3）。<sup>33</sup> 是鑄工求變的一種表現，或者鑄工知道曾經在內底飾盤龍紋，但已過時，故將之飾於外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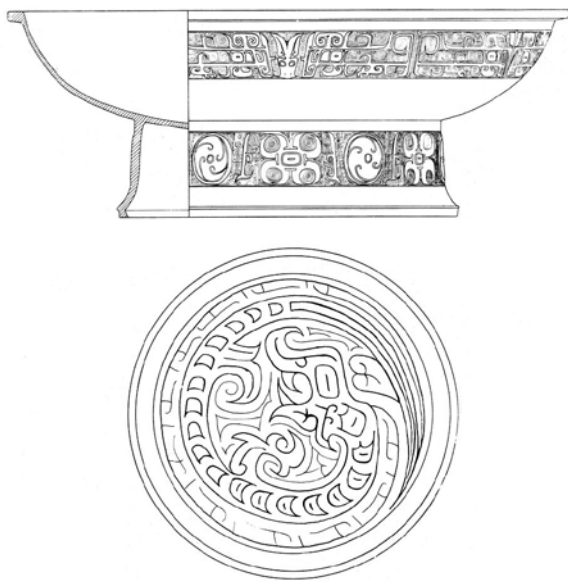


圖 7.3 涇陽高家堡盤 M4:15（引自《高家堡戈國墓地》圖 82）

#### （四）西周中、晚期

一般認為西周中期從穆王開始，晚期以平王東遷雒陽宣告西周終結為結束。如果說西周早期青銅工業和制度多繼承自殷商，經過數代人，西周的宗法制度已經確立，自殷遷來的鑄工都已故去，周人自己的面貌和取向支配着中、晚期的青銅工業，青銅藝術與

33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國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頁28、97-98，圖82、86.1-3，圖版13、50。

技術。<sup>34</sup>

西周中期青銅器的一些變化，或許是有學者所指出的禮制變化或革命的結果。<sup>35</sup> 有些是嘗試性的，旋生旋停，或者很快發生變易，如盤的附足；有些是持續性的，如西周早期青銅盤偶爾出現的附耳，到西周中期成為定制。

青銅盤圈足下或圈足外出現柱形附足，大概可以上溯到西周早、中期之交或略晚。晉南天馬一曲村墓地出土的家父盤 M6384:5，敞口，腹略深，斜沿，厚方唇，腹外壁飾鳥紋帶，雲雷紋襯底，其下有一周凸弦紋。弦紋下對置∩形附耳，頂部與口沿平齊，底下設矮圈足，圈足外三隻螺紋柱足承器（圖 8.1）。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晉韋父盤（圖 8.2）與之高度一致，<sup>36</sup> 就此兩件難以判斷它們是否為晉盤的一個時代特色，但盤形和紋飾風格明顯具有早商特徵，而螺旋狀柱足當是新的改造。雖然這類柱足曇花一現，但或許導致西周懿孝之世的免盤類的出現：圈足外均附三個獸足，而獸首浮雕在圈足外壁，獸身和足在圈足之下承器。<sup>37</sup> 盤具蹄形足在春秋中期後流行。此外，這類柱形附足引發了其他類型的附足，包括以獸承托圈足的獸形足和以人承托的人形足。獸形足的獸姿或走或臥，人形足或站立或踞踞。前者如湖北隨州安居桃花坡一號墓出土的春秋早期起右盤，形態特殊，構形前流後鑿如匜，三獸背負圈足（圖 9.1）；河南羅山高店龍埂窖藏出土的奚君單盤，圈足下附四臥獸足

34 也有以西周共王分界，將西周劃分前後兩期的分期方法，具體參考曹璋的討論。曹璋：〈周原西周銅器的分期〉，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研究（二）》（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四十周年 1952-1992），（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年），頁 144-165。

35 曹璋：〈從青銅器的演化試論西周前後期之交的禮制變化〉，收入周秦文化研究編委會：《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443-456。

36 鄒衡主編：《天馬 - 曲村（1980-198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495-501、1136，圖 698.2、699.2，圖版 104.1-2，彩版 19.1。周亞：〈晉韋父盤與盤盃組合的相關問題〉，《文物》2004 年第 2 期，頁 61-69。

37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729。

(圖 9.2)。<sup>38</sup> 後者如山東曲阜望父台出土的西周中晚期魯司徒仲齊盤 M48:8，盤下三人足蹲姿，手背後托起圈足，雙附耳上飾臥牛(圖 10.1)；陝西扶風齊家窖藏出土的西周晚期匱盤，三人跪地肩負圈足(圖 10.2)；山東滕州後荆溝西周晚期墓出土的盤，三站立人形足背手托圈足底沿(圖 10.3)。<sup>39</sup> 這兩類足可分別對應子仲姜盤和晉公盤。

與此變化相應，盤內底鑄銘越來越長，一些盤似乎就是長篇銘文的承載體，具代表性的如西周恭王時期的強盤(銘 284 字，圖 11.1-2)，厲王時期的袁盤(銘 101 字)和散氏盤(一名矢人盤，銘 357 字)，宣王時期的虢季子白盤(銘 111 字)、兮甲盤(銘 133 字)和速盤(銘 372 字)等。<sup>40</sup> 在這一時期，圈足下出現附足，並演變出幾種形式。從工藝上看，獸形足和人形足多分鑄鑄接，具體方式待考；而盤體連同附耳基本上渾鑄成形、腹部三分範(包括耳內兩活塊範)是主流。

然而，在這一階段，青銅盤依然是數量少、身分特別的器類，只有大墓才會隨葬。周原出土青銅器涵蓋整個西周時期，並以中、晚期為多。據曹瑋歸結，周原出土青銅盤八件，三件出土於墓葬，

- 38 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縣安居出土青銅器〉，《文物》1982 年第 12 期，頁 5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國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頁 246-248。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河南羅山縣發現春秋早期銅器〉，《文物》1985 年第 1 期，頁 51-53。《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七卷，圖 98。
- 39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阜魯國故城》(濟南：齊魯書社，1982 年)，頁 160。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六卷，圖 72、80。梁星彭、馮孝堂：〈陝縣長安、扶風出土西周銅器〉，《考古》1963 年第 8 期，頁 413-415。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第二卷，頁 263-265。萬樹瀛：〈滕縣後荆溝出土不嬰簋等青銅器群〉，《文物》1981 年第 9 期，頁 25-29。
- 40 寶雞市周原博物館：《周原莊白西周青銅器窖藏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年)，頁 40-42。《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六卷，圖 143；第五卷，圖 198。故宮博物院：《故宮青銅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頁 216。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頁 153。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345-349、323-327。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考古研究所、眉縣文化館：《吉金鑄華章——寶雞眉縣楊家村單氏青銅器窖藏》(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年)，頁 184-191。



圖 8.1 家父盤 M6384:5 (引自《天馬—曲村 1980-1989》彩版 19.1)



圖 8.2 晉韋父盤 (周亞教授惠供)



圖 9.1 起右盤 (引自《曾國青銅器》頁 246)



圖 9.2 奚君單盤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7 圖 98)



圖 10.1 魯司徒仲齊盤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6 圖 72)



圖 10.2 包盤 (引自《周原出土青銅器》卷 2 頁 263)



圖 10.3 滕州後荊溝盤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6 圖 82)



圖 11.1 強盤（引自《周原莊白西周青銅器窖藏考古發掘報告》圖版 57）



圖 11.2 強盤銘文（引自《周原莊白西周青銅器窖藏考古發掘報告》圖版 58）

佔墓葬容器 2.3%，五件出自窖藏，佔窖藏容器 2%，<sup>41</sup> 比例接近，反映了周原，甚至是西周青銅盤的格局。

### （五）春秋時期青銅盤

東周時代是古代中原社會劇烈變動時期，持續數百年而未央。青銅鑄造的格局多不清楚。但據考古實物顯示，這一時代的青銅盤在中期發生了很大變化，產生的結果一方面是普及化：略大的墓葬，如考古學家劃分的一鼎墓也隨葬青銅盤，有的較大墓還隨葬多件盤。

較為特殊的是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的虢季墓 M2001，發掘報告認為墓主為一代虢君。這座墓曾被盜，兩個盜洞中一個是新近的，葬具為一槨重棺。劫後之墓仍出土了青銅禮器五十八件，考古報告分它們為實用器和明器，隨葬四件青銅盤也是如此。一件虢季盤 M2001:99 為實用器，通高 170、口徑 398 毫米，重 5,800 克。斜沿方唇，腹部飾竊曲紋帶，一對方附耳內側出短橫梁與唇相連，外面

41 曹璋：〈周原西周銅器的分期〉，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研究（二）》（紀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四十周年 1952-1992）（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年），頁 144-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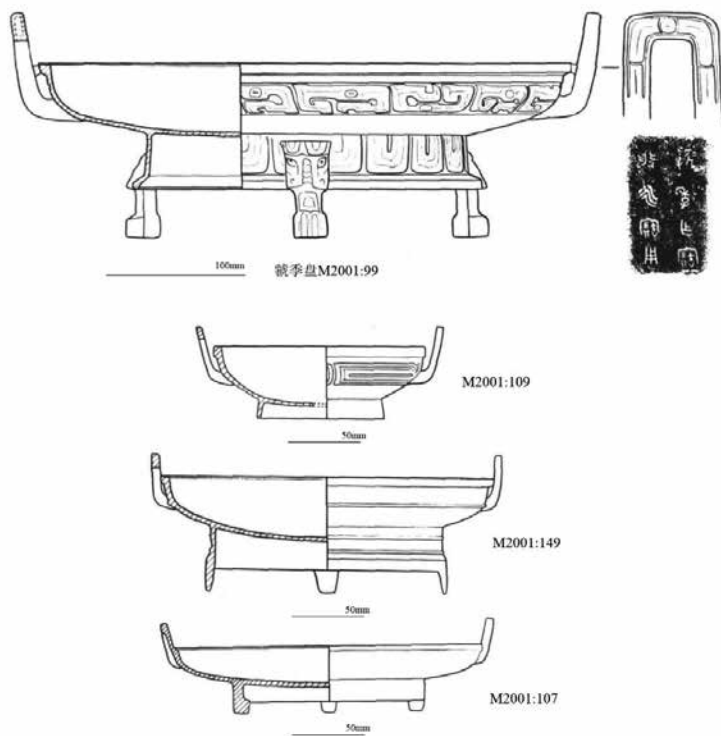


圖 12 虢季墓隨葬的四隻盤（據《三門峽虢國墓》卷一圖 58、59）

飾重環紋。高圈足上段徑小壁直，飾垂鱗紋帶，下端外撇並直折出窄裙，三獸形附足，獸首疊壓者垂鱗紋帶，板狀身體和蹄足承器，內壁平而外壁鼓。盤內底鑄銘兩行八字「虢季作寶盤永寶用」。另外三件均為明器，M2001:109 通高 70、口徑 160 毫米，腹飾重環紋帶；M2001:149 通高 105、口徑 250 毫米，腹與圈足各飾一周凸弦紋；M2001:10 素面。通高 70、口徑 230 毫米（圖 12）。與虢季盤對比，這三件盤形小而粗糙。虢季盤與龍紋盃 M2001:96 配組，兩件明器盃 M2001:117 和 M2001:119 形制相同，<sup>42</sup> 其一或與盤 M2001:109 組配，別無所知。

虢季盤的足與西周中期免盤的一致，在西周晚期有一定代表性。但與之組配的盃 M2001:96，扁鼓腹，盤龍蓋，龍流獸鑿四人足，不鑄銘，顯然與盤生硬配套。發掘報告認為墓葬年代為西周晚

4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頁 63-69、圖 58-62，224-225。



期，但隨葬四件盤未見先例，故宜置於春秋早期。

春秋早期青銅盤變化的另一結果，是自春秋中期開始，晉和三晉相當多的盤腹外不鑄造紋飾，至於是否彩繪紋飾當可懷疑，盤底下設三蹄足，兩隻 S 形方附耳，僅有的紋飾可能在附耳頂面，成為盤的主流，盤往往與匹配組隨葬。晉系青銅盤的這些特徵，與魯南多數盤一致，但與楚式和曾式盤有較大不同，後者腹壁多飾紋帶，並布設環鈕銜環，以獸形環足承器。<sup>43</sup> 此外，如虢季墓一樣，出現了一批粗糙的所謂明器。這些盤明顯具有葬器的性質，製作用於隨葬。

子仲姜盤和晉公盤的年代正處在發生大轉變的春秋早、中期，兩件盤裝飾華麗、工藝奇特，在呈現出一些新要素的同時，卻更多的體現和採用了傳統的裝飾。

### 三、早期青銅盤內魚、龜和盤龍紋飾

子仲姜盤和晉公盤均屬春秋時代。平王東遷之後，周室衰微，「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公羊傳》僖公四年）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徐中舒（1898-1991）探討外來文化對中國青銅器的影響，即置於這一背景下，在確認薄器「大部分均為中國文化上自身之演進」之外，認為「浮雕，鑲嵌，獸之飛躍，倦息，與羽人，飛獸，操蛇，踐蛇等圖像，仍具有強烈的外來色彩。」<sup>44</sup> 九十年過去了，而今的材料非同日而語，可以重新討論青銅器造型和紋飾的源流關係及其演變機制了。

青銅盤被歸為水器，敞口淺腹，便於表現盤內紋飾。這種現象出現於中商時期，先在底部後來發展到內壁，渦紋、龜紋和魚紋是主要內容，晚商早期有長足發展，盤龍紋成為內底的主要紋樣。在此，討論龜紋和渦紋、魚紋、盤龍紋三類四種。

43 蘇榮譽、黃鳳春：〈隨州文峰塔青銅媿澆作盤研究——兼論春秋晚期漢水和淮河流域青銅盤的格局〉，《荊楚文物》，即刊。

44 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收入《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頁571。

### （一）渦紋和龜紋

目前所知，盤內飾紋始於中商，先只在內底中央飾圓渦紋。前揭城固龍頭火疙瘡第一次窖藏出土盤，<sup>45</sup> 內底中間飾細線圓渦紋，大圓圈向內順時針方向向內均勻地依次勾出六道弧線，中心有一小圓圈（見圖 5.2），並在渦紋外邊鑲環狀圓圈紋。圓渦紋定名出自容庚（1894–1983），認為圓圈內「有曲線五若微渦之激起」，<sup>46</sup> 但沒有涉及中心的小圓圈。馬承源（1927–2004）稱其為火紋，為太陽標誌，其「特徵是圓形，中間略微凸起，沿邊有四到八道旋轉的弧線，表示光炎的流動」。進而指出二里頭文化已發現單個的火紋，只有圓形而沒有旋轉弧線。<sup>47</sup> 明顯有泛太陽崇拜之嫌。

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出土兩件青銅盤，其中一件內底飾陰線圓渦紋，外環一周圓圈紋鑲邊，內壁飾三組魚紋（圖 13.1-2），<sup>48</sup> 圓渦紋雖不夠清楚，但與火疙瘡盤風格一致，而盤內壁飾三條魚，或者說明略晚於彼。前揭山西石樓桃花者出土的青銅盤，內底中間飾陰線圓渦紋（見圖 5.4），除圓圈內「曲線五」與火疙瘡盤「曲線六」之微別外，圓渦紋相同，然外無鑲邊，而盤內壁則均飾有三魚紋，年代或略晚於火疙瘡盤。安陽武官村一座晚商墓，劫餘的一件盤 M259:4（圖 13.3），內底的圓渦紋外只有細環線，較火疙瘡盤還要簡單，但盤腹內壁均飾三條魚紋（圖 13.4），<sup>49</sup> 裝飾與桃花者盤一致，年代應相同。但需注意，其造型與裝飾風格與殷墟早期的婦好盤相差太遠，呈現出強烈的中商特性，是殷墟墓隨葬早期器的典型，<sup>50</sup> 說明盤被輾轉流傳了一個時期才隨葬。

45 王壽芝：〈陝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頁 3–9，圖 7–8。曹瑋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頁 157–158。

46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41 年），頁 121。

47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收入氏著：《中國青銅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355–395。原載於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編：《商周青銅器紋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頁 233。

48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文物》1977 年第 11 期，頁 1–8，圖 6.3、7。

4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 259、260 號墓發掘報告〉，頁 99–117，圖 17.1、圖版 13.3。《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三卷，圖 170–171。

50 蘇榮譽：〈商前期青銅盤研究〉，《故宮學術季刊》，即刊。



圖 13.1 平谷劉家河青銅盤（王顯國先生惠供）



圖 13.2 劉家河盤（引自《文物》  
1977 年 11 期頁 5 圖 7）



圖 13.3 安陽武官村盤 M259.4（引自《中國青銅器  
全集》卷 3 圖 171）



圖 13.4 武官村盤 M259.4 內壁（引  
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3 圖 170）

中商風格的青銅盤，內底裝飾渦紋並不多，多數裝飾龜螭紋。陝西清澗張家瓜出土的一件盤（圖 14.1），<sup>51</sup> 內底中心飾一陰線游水龜紋，龜頭長伸，四肢張開劃水，背中部飾七線圓渦紋，其中心也有小圓圈，外周則鑲嵌不規則的圓圈紋，腹內壁飾三魚紋（圖 14.2）。去掉龜頭和四肢，與火疙瘩盤的圓渦紋一致。可以推測盤底的圓渦紋可能是龜紋的簡化或象徵。

中商階段青銅盤內底飾渦紋或龜螭紋，內壁多配三條魚紋，並形成了固定搭配，說明龜螭紋與圓渦紋具有某種互換性，渦紋明顯與水有關而不可能與火有關。1936 年在安陽小屯發掘的一組墓中，M232 出土一件盤 R2073，腹外壁飾三周凸弦紋，內底飾龜紋，頭

51 戴應新：〈陝北清澗、米脂、佳縣出土古代銅器〉，《考古》1980 年第 1 期，頁 95、70，圖 1，圖版 12.4。曹璋主編：《陝北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9 年），第二冊，頁 234-237，第一冊，頁 28。

已抽象化，四爪或作爬行或蜷伏狀，背中心飾六線渦紋，但中心無小圓圈，外周以六組雲紋組成的環，與渦紋一同成為龜背裝飾；盤內壁飾六條魚紋（14.3）。很明顯，與張家瓜盤相比，這件盤無論龜紋的抽象化和背部紋飾的裝飾性，還是內壁魚紋的增加，都體現出其過渡性，年代可確定在中商晚期。

進入到商晚期，紋飾趨於繁麗。盤內底龜紋變大，腹內壁魚紋數量增多，連續成魚貫的紋帶。早年尊古齋經手、後為中山定次郎收藏的一件盤堪為典型（圖 15.1），甚至出現了如善齋劉體智（1879–1962）曾經收藏的一件盤，龜紋很大，腹內壁魚紋變形並與



圖 14.1 清澗張家瓜盤（引自《陝北出土青銅器》頁 234）



圖 14.2 張家瓜盤內壁（引自《陝北出土青銅器》頁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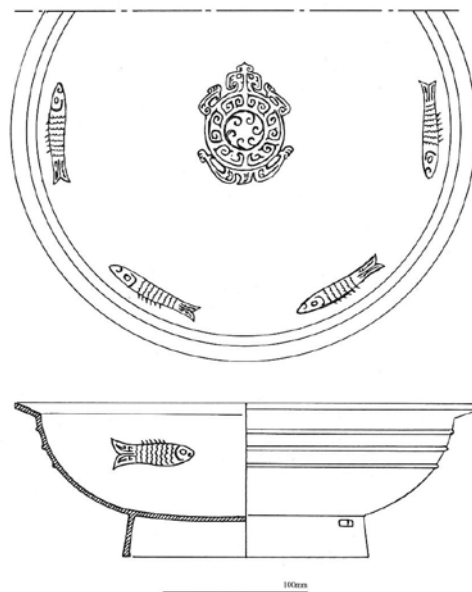


圖 14.3 安陽小屯 M232 盤 R2073（引自《殷墟出土五拾叁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圖版 53.2）



圖 15.1 山中盤（引自《日本菟儲支那古銅精華》2.86b）



圖 15.2 龜魚鳥紋盤（引自《商周彝器通考》附圖 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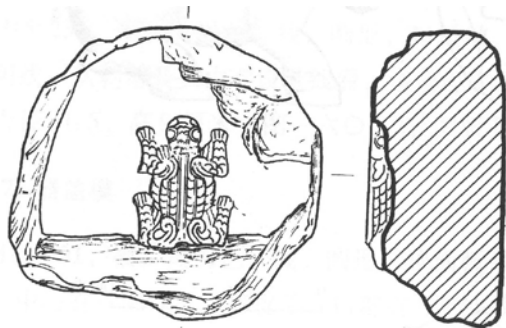


圖 15.3 侯馬白店龜範 H15:32（引自《侯馬白店鑄銅遺址》頁 173 圖 156.4）

鳥紋同列的現象（圖 15.2）。以至鑄造成對的圓雕螭的藝術品，中國國家博物館和臺灣私人收藏的作冊般甬即是十分特別的作品。<sup>52</sup> 很快，晚商早期鑄銅臻於鼎盛，盤龍紋代替了龜螭紋，龜螭紋式微。

西周時期龜螭紋材料匱乏，似乎在春秋早期得到了某種復興。子仲姜盤內底浮雕龜紋是早期代表，而晉公盤內底不僅裝飾浮雕水龜，還裝飾四隻圓雕螭。將浮雕與圓雕一同表現，未必是當時的風行做法，或者是鑄工為這件盤的機巧之能。但是，浮雕的做法在春秋晚期被延續，在侯馬鑄銅遺址出土模範和侯馬風格青銅器上，均有實例（圖 15.3）。<sup>53</sup>

52 蘇榮譽：〈晚商作冊般青銅甬的工藝及相關問題〉，《江漢考古》2022 年第 1 期，頁 106-112。

5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白店鑄銅遺址》（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71。

## （二）魚飾

魚是地球上種類最多的脊椎動物，遍布水生環境，是人類重要的食材。在仰韶文化彩陶裝飾中，魚是重要的動物紋樣，並有諸多變體以至形成裝飾圖案。羅森（Jessica Rawson）注意到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盆內壁已刻畫三條魚紋。<sup>54</sup> 中商階段開始裝飾青銅盤內壁時，盤底往往裝飾渦紋和龜鱉紋，腹內壁裝飾三條魚紋。龜鱉和魚都是水生動物，某些盤裝飾渦紋，可能表示水，也可能是龜鱉的符號。

中商階段的盤腹內壁裝飾的魚紋，均細陰線型，多數魚紋屬於細長條類，如桃花者盤，前有兩根長鬚，身披鱗紋，右側兩鰭、左側一鰭，尾長而細（見圖 5.4），武官村盤也是如此（見圖 13.3）。但平谷劉家河盤較特別，魚紋兩側鰭很大，視覺上寬短（見圖 13.3）。如上節所及，在中商末段，如小屯盤盤底龜鱉紋變大，腹內壁魚紋相應增多，雖然魚形與桃花者的細長形相類，但已無鬚，鰭也不現（見圖 14.3）。

晚商早期青銅盤內壁，少數飾魚紋帶，如小屯盤 M18:14 內壁十二條魚逆時針相貫，魚頭長大眼，身飾前端出頭的 8 形紋，兩側各出雙鰭，剪刀形魚尾，線條粗細均勻（見圖 6.4）。婦好盤內壁由魚、鳥和獸紋三幅一組，三組紋飾組成紋帶，魚紋變形，具有夔首，張口，身兩側各二長鰭如翼，剪刀形尾（見圖 6.1）。至於婦好墓另一盤 M5:853，內底龍頭旁填飾一大一小兩條魚紋，身飾 8 形紋、兩側各兩鰭（見圖 6.3）。在晚商早期青銅器紋飾富麗化中，某些青銅盤內壁的紋飾為浮雕型，下文再論，但到殷墟中期，盤內紋飾迅速衰退，魚紋匿跡。

從西周墓葬出土相當多數量的青銅魚、錫魚和玉魚看，對魚的情懷始終還在，但這些多是棺上所覆荒帷的墜飾。

兩周之際，在青銅盤上甚或主要在盤上可以看到很強的復古

54 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ume IIB*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0), 602, note 5.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5 年第 5 期，頁 215-224，圖版 3.3。



圖 16.1 武英殿魚匜盤（引自《武英殿彝器圖錄》頁 85）



圖 16.2 武英殿魚匜盤魚紋（引自《武英殿彝器圖錄》頁 86）

風氣，魚紋再度出現在青銅盤上。清宮武英殿收藏的一件魚匜盤，高三寸五分，口徑一尺一寸九分，重一百三十六兩。窄平沿，厚方唇，外弧腹壁上段飾重環紋帶，下腹飾水平瓦稜紋，圈足也飾水平瓦稜紋；圈足均布三個獸形附足，高浮雕獸頭部分在圈足外壁，板形蹄足出露在圈足沿下以支撐盤。此盤的特別造型在於前邊出槽形流，與之相對的龍形鑿曲作 C 形，龍頭雙角內卷，口含盤沿。盤內飾一周陰線魚紋帶，十三魚紋順時針相貫，上下均有陰弦紋作邊，紋帶外各有一周陰弦紋（圖 16.1-2）。容庚著錄此器指出：

匜之用所以瀉水，盤之用所以承水，此器形為盤而有流，有鑿似匜，蓋一器而兼二者之用也。銘魚形十三，環列腹內，盤承水之器，故有繪魚龍之紋於其中者。漢洗多作雙魚文，蓋導源於此。此雖魚形大小變化不同，然屬於文字而非花紋矣。<sup>55</sup>

容庚認為魚為銘，恐失察。據前文對青銅盤裝飾魚紋的梳理，可確知這種裝飾源於商中期青銅盤，並往往與龜紋或渦紋配合。安陽時期則與盤龍紋、鳥紋、夔紋等配合，而且有若干盤有銘，如「婦好」、「旅」、「亞矣」等，銘文與紋飾分別得很清晰，魚紋並非銘文。盤與魚紋具有密切關係，應該和盤作為水器有關，或者與觀賞

55 容庚：《武英殿彝器圖錄》（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4年），頁 85-86。

魚有關。

前述的復古風潮中，一些消失很久的裝飾再現於青銅器。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出土了兩件春秋早期青銅盤，其紋飾頗為明顯。盤 M1744:1 的腹內壁飾一周寬紋帶，由一周向右魚貫而遊的魚紋，以雲雷紋襯地和填充而構成，紋帶的上下以圓圈紋帶鑲邊（圖 16.3）。內底飾盤曲的蛇紋和填充的雲紋，蛇頭不大蛇身由中間的一路寬鱗片和兩側兩路窄鱗片構成，中路鱗片上有短陰線，斷續構成中脊；蛇尾尖細。雲紋含義不明，圓團外周環圓圈紋帶（圖 16.4）。盤 M1761:2 腹內壁裝飾魚紋帶，內底飾盤龍紋（圖 16.5）。<sup>56</sup> 盤底與腹內壁紋飾都是晚商早期風格的再現。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接受賽克勒捐贈的一件盤（編號 1975.66.2），1963 年山東肥城小王莊出土的一件魚龍紋盤，<sup>57</sup> 均與虢國墓盤高度一致，都是這一時復古風潮的產物，是否出自同一作坊，待考。

春秋早期鑄工求變的動力被激發，出現了不少變革和創新。吳鎮烽著錄一件季大盤，藏於私家，與吳季大鼎、甗、簠、匜同出，內底鑄銘十四字：「季大作其盤匜，眉壽無疆，永寶用之」，時代在春秋早期。<sup>58</sup> 據圖（圖 17.1），盤口微內斂，寬平沿，厚方唇。弧腹外壁飾變形夔紋帶，一對方附耳聳出口沿，底下所接圈足徑較小，圈足上段飾兩周透空鱗紋，下短直折成裙。盤內底中央鑄銘四行十四字，左讀。其外周飾以兩圈浮雕魚紋，內圈七條，外圈十三條；均順時針遊弋。毫無疑問，子仲姜盤和晉公盤腹內壁的浮雕魚紋與這件季大盤有關。

吳季大盤並不孤立，與之相類的是上海博物館藏的鄭伯盤，通

56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嶺虢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年），頁 18，圖版 18-19。《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七卷，圖 11。

57 Jenny So, *Eastern Zhou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ume III*,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5), 314-319. 齊文濤：〈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72 年第 5 期，頁 3-16，圖 21-22。

58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三卷，第 0936 號。





圖 16.3 上村嶺魚紋盤 M1744:1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7 圖 11)



圖 16.4 上村嶺魚紋盤 M1744:1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7 圖 13)



圖 16.5 上村嶺盤 M1761:2 (引自《上村嶺號國墓地》圖版 18)



圖 17.1 季大盤 (引自《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第 3 卷，第 0936 號)

高 135、口徑 379 毫米，重 5,550 克 (圖 17.2)。盤口微斂，淺腹。平沿，方唇外出，外弧腹壁是一周蟠曲龍紋帶，紋帶下欄有高高凸起的邊棱，一對 C 形龍耳雙角高聳、口銜盤沿。底下圈足為透孔垂鱗紋，向外弧撇接圈形底沿。盤中心鑄一圈銘文十三字：「鄭伯作盤匱，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圍繞銘文，分別飾內、外兩圈浮雕魚紋，內圈八尾、外圈十二尾，均順時針排列 (圖 17.3)；時代被定在春秋早期。<sup>59</sup> 和前述季大盤對照，除龍耳外，兩件盤的造型和裝飾幾乎完

59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博物館藏品（東周篇）》，頁 86-87。《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七卷，圖 28。



圖 17.2 鄭伯盤（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7 圖 28）



圖 17.4 李峪盤（引自  
*A Commemorative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pl.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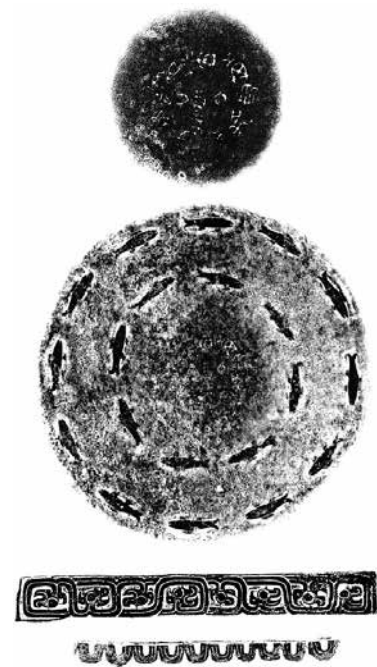


圖 17.3 鄭伯盤紋飾（引自《夏商周青銅器研究（東周篇）》頁 87）

全一致，應是同一作坊的同組鑄工鑄器，但分屬吳、鄭，說明兩國均在同一作坊定制青銅器。

1923 年山西渾源李峪出土的春秋晚期青銅器群中，一件殘盤收藏在巴黎基美博物館（先在羅浮宮博物館），寬 440 毫米，盤內底滿布浮雕魚紋和龜紋，魚紋和龜紋相間成行排布，同一行方向一致，相鄰兩行方向相反（圖 17.4）。<sup>60</sup> 不僅改變了季大盤和鄭伯盤浮雕魚紋的布局，從環列改為行列，並且添加了浮雕的游水龜鱉，無論裝飾題材還是手法，都是子仲姜盤和晉公盤浮雕裝飾的延續，但圓雕動物附飾被拋棄了。

李峪青銅器群屬春秋晚期，器物鑄造於侯馬鑄銅工廠。在侯馬鑄銅遺址中，不僅出土若干魚紋模範（圖 18.1-3），<sup>61</sup> 還有多件侯

60 *The Chinese Exhibition: A Commemorative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Royal Academy of Arts, November 1935–March 1936*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6), 25.

6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陶範藝術》（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355–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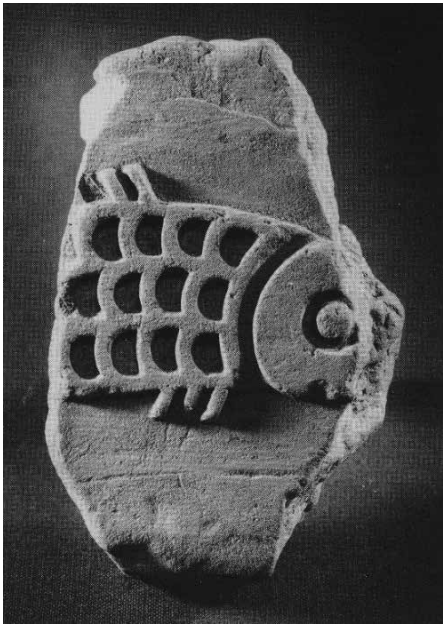


圖 18.1 侯馬魚紋模 IIT47H419 (引自《侯馬陶範藝術》頁 355, No. 801)



圖 18.2 侯馬魚紋範 IIT19 ④ (引自《侯馬陶範藝術》頁 355, No. 803)



圖 18.3 侯馬魚紋範 IIT15 ④ (引自《侯馬陶範藝術》頁 356, No. 804)



圖 19.1 弗利爾狩獵紋鑿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8 圖 97)



圖 19.2 弗利爾狩獵紋鑿內壁紋飾 (引自《侯馬陶範藝術》頁 41 圖 10)



圖 19.3 大英博物館藏壺



圖 19.4 克萊斯勒藝術博物館藏壺 (引自 *Oriental Art* 2019.11-12, p. 53 fig. 24)

馬風格的青銅器內壁或外壁裝飾浮雕魚紋，如收藏於華盛頓弗利爾藝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的狩獵紋鑿（藏品號：15.107，圖 19.1），腹內壁紋飾分上下段，上段一周水鳥和遊魚相間紋，下段為一周龜紋，俱是浮雕型式（圖 19.2）。徐中舒早已指出此鑿年代應與李峪盤同時。<sup>62</sup> 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藏壺（編號 1991.0802.1，圖 19.3）和諾福克克萊斯勒藝術博物館（Chrysler Museum of Art, Norfolk）藏壺（編號 59.82.1，圖 19.4）造型相同，腹部有風格一致的水鳥銜魚和魚、鰲相間的浮雕紋帶，這些器物可與侯馬鑄銅遺址出土的模範相對應，說明鑄自侯馬。<sup>63</sup> 而侯馬鑄銅的這種風格淵源，與子仲姜盤、晉公盤都有關係。

侯馬鑄銅工廠的建立不早於晉景公於西元前 585 年遷都新田，所出土的模範和由之鑄造的青銅器可概括為侯馬風格。但晉國何時開始鑄造青銅容器，此前在哪裡鑄造，規模如何，內涵怎樣，等等，都不清楚。包括圓雕動物附飾、浮雕動物紋裝飾，是否即是晉國青銅器特色，也都不明白。但可以明瞭的是，在春秋晚期，侯馬鑄銅工廠繼承並發揚了早期微弱的特色，並應用到了更多器形的裝飾上。

### （三）盤龍紋

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寺文化陶盤內，即彩繪盤龍為裝飾，盤並不實際使用，作為盤龍紋的載體，用於隨葬，其非凡寓意還難以確知。

盤龍紋裝飾青銅盤始於晚商早期。婦好盤內底飾一盤龍紋，龍頭碩大，吐出三角形舌或信，闊鼻，鼻頭兩側嘴角深咧，一對臣字形大眼中，圓眼珠偏向兩側，眼上有平行線眉；眼外還有葉形雙

62 A. Pope, R. Gettens, H. A. Pope, R. Gettens, J. Cahill, and N. Barnard, Cahill, & N. Barnard,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 Catalogue*,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1967), 484–8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陶範藝術》，頁 41。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頁 582、595。限於型式材料，徐氏斷它們年代為公元前三世前後，進而推論鳧魚龜形之浮雕為斯基泰輸入，失據。

63 Quanyu Wang, Yi Chen, and Rongyu Su, “Houma Bronz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 Technical Study,” *Orientalism*, November/December (2019): 44–63.

耳；龍面勾雷紋，額中飾菱形塊。頭頂兩側豎立一對長頸鹿型角；龍身盤曲約 450°，身縱貫菱形紋，角對角延伸，兩側填三角紋，直至尖尾；身兩側均鑲扉棱飾，相間勾 I、T 線。龍頭前筆架形圖案含義不明，龍頭兩側均鑄銘「婦好」，頸後填一夔紋（見圖 6.1）。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1887–1975）收藏的一件夔典斝盤藏於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編號 B60 B89），直徑 324 毫米（圖 20.1），斜沿，厚方唇，底微圓，高圈足。腹外飾夔紋帶，圈足飾獸面紋帶，腹內壁飾魚、鳥、獸紋成組的紋帶，底飾大盤龍紋，構圖以至銘文安排與婦好盤高度一致，但龍眼珠圓凸（圖 20.2）。<sup>64</sup> 華盛頓弗利爾藝術館收藏的一件盤（藏品號 56.26），沒有銘文，但盤龍造型和婦好盤一致，且紋飾中填有赭色顏料以凸顯紋飾（圖 20.3–4）。<sup>65</sup> 大英博物館收藏的父戊盤（藏品號 1952.12–16），通高 131、口徑 340 毫米）敞口，淺腹，寬弧沿，方唇，外壁紋帶再三小獸面紋兩側布局夔紋，上下以寬線 L 紋鑲邊，圈足直徑較小，所飾獸面紋大且有脊棱形鼻梁，紋帶上側以寬線 L 紋鑲邊，頗為特殊，紋帶均以細密雲雷紋襯底。盤內壁飾一周鳥紋和虎紋組成的紋帶，沒有魚紋，別致；但內底盤龍紋規整精緻，頭與小屯 M18 盤接近而身與夔典斝盤接近，且吻前填兩蛇紋，面旁填兩魚紋，耳後填兩虎紋，身飾兩列羽鱗紋且兩側有扉棱紋鑲邊。鼻梁鑄銘「父戊」。羅森（Jessica Rawson）和林巴奈夫（Hayashi

64 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77), 52–5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第 16 冊，頁 100，No. 10046。

65 John A. Pope, et al,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 Catalogue*, 34–39.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 3 卷，圖 174–175。蘇榮譽：〈凸顯紋飾：商周青銅器填紋工藝〉，《青銅器與金文》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頁 313–367。



圖 20.1 典折盤（引自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p.53）



圖 20.2 典折盤盤龍紋（引自《殷周金文集成》10046）



圖 20.3 弗利爾盤（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3 圖 174）



圖 20.4 弗利爾盤內紋飾（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3 圖 175）

Minao, 1925–2006) 將此盤年代斷為西周早期，<sup>66</sup> 顯然錯誤，這是典型殷墟早期盤，大體與婦好盤同時。

小屯盤 M18:14 底部盤龍紋與婦好盤接近，然盤旋約  $810^\circ$ ，耳張大，龍身右側鑲扉稜紋，左側為圓圈紋，但圓圈間距略大。此外，菱形紋和三角紋中填紋構圖不同，更大的差別在於此龍將婦好盤龍頭前筆架形裝飾結合到前吻（見圖 6.4），含義同樣不明。龍紋

66 Jessica Rawson, *Chinese Bronzes Art and Ritual* (Lond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7), 76–78. 林巳奈夫著，廣瀨熏雄 (Hirose Kunio)、近藤晴香 (Kondo Haruka) 譯，郭永秉潤文：《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圖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362，盤 36。羅森的斷代或許本於林巳奈夫，但後者的青銅器知識幾乎囿於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對器物的斷代多可商榷，本文所採引盤不少見諸他的研究和圖錄，作者認為沒必要一一引述，特注。貝格立認為其年代屬商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 42, fig. 210).



圖 21.1 溫嶺樓旗村盤（引自《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卷頁 146）



圖 21.3 蟠龍紋盤（引自《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品》頁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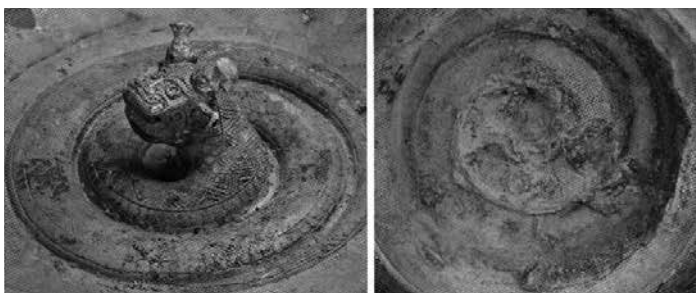


圖 21.2 樓旗村盤內紋飾與盤外底（引自《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卷頁 146）

圖樣與太田真造所藏的舟盤一致。<sup>67</sup> 婦好墓出土另一盤 M5:853，盤龍紋盤卷約 450°，龍頭側面，開口向下，露出鋸齒形牙，長象鼻勾起，葉形耳豎在頭頂，龍身由中間寬鱗片紋帶與兩側窄鱗片紋帶合成。龍頭前後填飾魚紋、夔紋和獸紋（參見圖 6.3）。可見，晚商早期青銅盤的盤龍紋飾，姿態相近，構圖有一致的，也有頗互存出入的，說明出自不同鑄工組群。

青銅盤底的盤龍紋飾在殷墟中期趨於式微，在殷墟晚期盤中幾乎消逝不見。浙江溫嶺樓旗村出土的一件盤，通高 230、口徑 615 毫米（圖 21.1）。<sup>68</sup> 盤腹略深，無耳，寬斜沿、厚方唇，腹部以六道長條形扉棱將紋帶分六組，以 I、T 相間紋帶鑲邊，高圈足上半紋帶也有六道長條形扉棱，但紋飾由三組構成，下邊鑲與腹部同樣的邊，圈足下段外撇並直折出較高立裙。內底高浮雕盤龍紋，圓雕龍頭從中心躍出，龍身盤兩周，飾鱗紋和三角細線紋帶。盤外底由盤

6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 16 冊，頁 89，No. 10017。

68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四卷，圖 174。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 年），第十九卷，頁 146。

旋形下凹與內底高浮雕龍身對應（圖 21.2）。這件盤目前還是獨一無二的孤器，淵源關係尚不明晰，但盤底內凸外凹的做法，與中商風行的南方風格器一致。加之它出土於東海之濱，可能還有更複雜的背景關係，同類器物未見於其他地域，說明它也是鑄工靈機一動率性而為的作品。

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收藏一件青銅盤十分別致。敞口淺腹，窄平沿，方唇，外弧腹壁是一順向右夔鳥紋，S形身軀上下帶點圓餅紋；細密雲雷紋襯底，無耳，盤底稍圓，下接三人頭形矮足。腹內壁飾魚、鳥、獸紋組成的紋帶，盤底飾大盤龍紋。<sup>69</sup>魚的形象與劉體智藏盤及婦好盤接近，內底龍紋與婦好盤和弗利爾藏盤接近，只是相對簡素一點（圖 21.3）。腹外壁夔鳥紋略晚，此盤年代或為商周之際。

兩周之際青銅器的復古，前面討論魚紋時，已經涉及到盤龍紋，而且一併出現，如虢國墓地出土盤 M1744:1 和 M1761:2，前者內底由盤曲的蛇和填充的雲紋構成，蛇頭不大，蛇身由中間的一路寬鱗片和兩側兩路窄鱗片構成，中路鱗片上有短陰線，斷續構成中脊；蛇尾尖細；雲紋含義不明，圓團外周環圓圈紋帶（參見圖 16.3）。後者雖然發表的圖像略微模糊，但基本上可以確定是龍紋，龍身由四列鱗片紋構成，龍頭的鼻翼和眼珠圓凸，但頭上 S 形並出歧的角頗為別致（參見圖 16.4）。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春秋早期魚龍紋盤，1969 年從上海冶煉廠廢銅中揀選而得，品相好，紋飾拓片清晰，或許可彌補虢國墓

69 天理大學、天理教道友社：《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品》（天理市：天理教道友社，1986 年），頁 60。羅森討論水野清一著錄的一件私藏的被定為西周中期青銅盤，腹內壁為魚、鳥、獸紋帶，內底滿布浮雕盤龍紋，構圖接近商，但腹外一對爬龍可能將盤年代推到春秋早期，或者兩周之際，那麼紋飾可以視為復古類型（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ume IIA*,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0, 67, fig. 63）。盤於 1993 年入藏弗利爾藝術館（藏品號 1993.16），蘇芳淑（Jenny So）也認為其年代在西元前十一到十世紀（Jenny So, *Eastern Zhou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ume III*,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5, 318, fig. 62.4）。





圖 22.1 上海博物館魚龍紋盤（引自《夏商周青銅器研究》（東周篇）》頁 80）



圖 22.2 上海博物館魚龍紋盤紋飾（引自《夏商周青銅器研究》（東周篇）》頁 81）



圖 22.4 番君白黻盤內底外飾（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第 7 卷，圖 112）



圖 22.3 番君白黻盤（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第 7 卷，圖 111）

地盤 M1761:2 不清楚之處。盤通高 139、口徑 330 毫米，重 3,500 克。敞口，腹略深，窄斜沿，方唇。腹外飾勾連 S 紋帶，對置  $\cap$  形附耳，耳廓內側出短橫梁與唇相接（圖 22.1）。底平，下接外撇的高圈足，底邊直折出窄裙。腹內飾一周十二幅相貫的魚紋帶；內底飾盤龍紋，大約盤卷  $540^\circ$ ，龍鼻翼、眼珠圓凸，面飾雲紋，頭頂一對寶瓶形角，身軀為兩並列雙鱗紋組成，並向盤內出足，頭前和頸側均填飾夔紋。連同腹內壁魚紋帶，都以細雷紋為地（圖 22.2）。陳佩芬認為此盤近於吳越文化模仿商周時代的器物，<sup>70</sup> 但未給出根據；所言鑄地也無據。

這一時期復古的青銅盤在淮河及其以南也發現有多件，但紋飾變易很多，類似新造，然多鑄銘，容易確定所屬。1978 年在河南潢川劉砦廟子崗出土一件番君白黻青銅盤，另有一件出土地點不詳，

70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博物館藏品（東周篇）》，頁 80-81。

兩件盤大小一致，型式和銘文相同，是僅見的成對盤。盤通高 120、口徑 315 毫米，敞口，口不圓，平沿，方唇；腹外飾竊曲紋帶，對設方附耳，內外飾紋；圈足外撇，飾竊曲紋帶，上附三獸足（圖 22.3）。盤內底中心飾兩條交盤的龍紋，外周環以顧首龍紋帶，其間鑄一圈銘文十八字：「唯番君伯黻用其赤金自萬年子孫永用之享」（圖 22.4）。簡報認為自字下漏掉「作寶盤」三字，時代在春秋早期。<sup>71</sup>

安徽青陽廟前汪村出土一件盤，通高 118、口徑 336 毫米；敞口，弧沿，方唇，腹外和圈足紋飾不清，可能是陰線雲紋帶，腹對置方附耳，另有四扉棱形飾，腹內壁飾一周魚貫紋，內底盤卷一蛇，身飾三列鱗紋，捲曲超過三周（圖 23.1）。<sup>72</sup> 順長江而下的安徽繁昌縣湯家山出土一件盤，紋飾特別，平沿上飾兩周方向相同的鱗紋帶，方唇，腹外飾顧首龍紋帶，兩側對設  $\cap$  形附耳，平底下接高圈足，其上段所飾紋帶也是顧首龍紋，下段喇叭形外撇，並下折出矮立裙（圖 23.2）。腹內壁飾順時針魚貫紋帶，細密雷紋襯底，上下有寬而平的弦紋鑲邊，其下另飾一周圓圈紋。內底紋飾也複雜，主體是盤曲蛇紋，頸後雙身平行盤卷  $450^\circ$ ，雙身飾同樣的鱗片紋。蛇頭和頸的兩側各布一個蜷曲兩周以上的大變形龍紋，並以細雷紋襯底（圖 23.3）。<sup>73</sup>

1930 年在江蘇儀徵破山口出土青銅器群中，一件青銅盤平折沿，圓唇，腹與圈足外壁飾夔紋帶，腹壁對置  $\cap$  形附耳。圈足頂直徑較小，壁外斜，下部外撇並直折出立裙。腹內壁飾一周逆時針魚貫紋，內底飾盤龍紋，龍頭構圖接近婦好盤，但鼻梁和眼珠圓凸（圖 23.4），而龍身與繁昌湯家山盤同，年代被認為屬西周晚期，<sup>74</sup>

71 鄭傑祥、張亞夫：〈河南潢川縣發現一批青銅器〉，《文物》1979 年第 9 期，頁 91-93。《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七卷，圖 111-113。後者著錄兩件盤，圖 111-112 出土於潢川劉砦，圖 113 出土於潢川彭店，據簡報，劉砦是彭店公社的一個大隊，出土資訊不明。

72 安徽大學、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頁 100-101。

73 安徽大學、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銅器》，頁 102-104。《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十一卷，圖 55。

74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六卷，圖 138。《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第七卷，頁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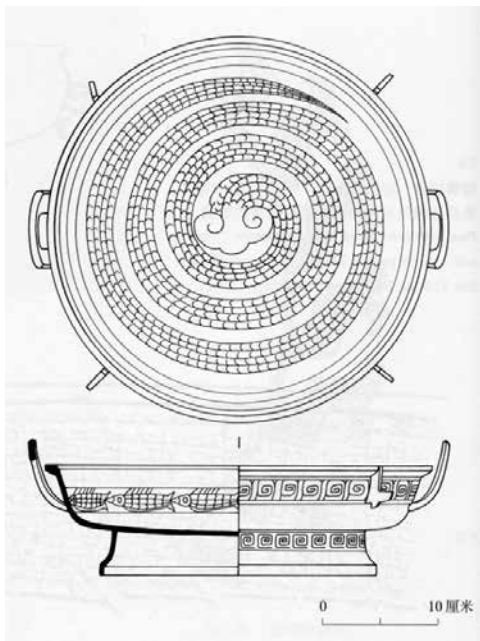


圖 23.1 青陽汪村盤（選自《皖南商周青銅器》頁 100）



圖 23.2 繁昌湯家山盤（選自《皖南商周青銅器》頁 102）



圖 23.3 湯家山盤網底飾（選自《皖南商周青銅器》頁 103）



圖 23.4 儀徵破山口盤（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6 圖 138）

可能以春秋早期為宜。

上述四件出自南方的青銅盤，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雖然盤的造型互有差別，內外紋飾有不小差異，但它們的格局和風格相當一致，與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盤頗為接近，都是復古概念下的產品。但復古藍本不同，所以構圖差異較大，但並不能分辨出產地。據出土地推定產地的做法完全無視青銅器可以長距離流動的事實。真正的產地需要鑄銅作坊材料予以證明，而這一時段的鑄銅遺址罕見。此外，不僅對復古風格器疑竇很多，就是那個時代的普通器，同樣諸多不明。有趣的是，復古風格較多地表現在青銅盤上，甚至僅見於青銅盤，應該與盤可更好表現、呈現紋飾、甚至與盤的功能密切相關。

#### (四) 蛙紋

貝格立 (Robert W. Bagley) 指出新石器時代馬家窯文化和仰韶文化陶器有飾蛙紋者，或可成為青銅器飾蛙的祖形。<sup>75</sup> 但蛙這種兩棲動物何時表現在青銅器上，目前還不清楚。

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中，M64 被確定為晉穆侯墓。晉穆侯當政在周宣王時期，隨葬的青銅器應屬西周晚期。其中一件晉叔友父盤 M64:140，腹較深，前出龍頭形管流，後接爬龍形鑿，與之相對設兩隻爬龍窺視盤中 (圖 24.1)。盤底中央伏臥一隻圓雕蛙，其周圍鑄銘「晉叔友父」(圖 24.2)，兩圈寬平鋪紋帶環繞着蛙，一圈窄浮雕魚紋帶介於其間 (24.3-4)。腹外飾竊曲紋帶，圈足下四立人背承圈足。<sup>76</sup> 丁忠明等指出蛙下應設有柱，蛙可繞其水平旋轉。<sup>77</sup> 新近得機會親炙此盤，蛙身下並無立柱，對丁氏之說作一補正。

友父盤的設計理念與安陽出土中柱盃一樣，具有強烈玩好性，而鑄工可借此炫技。重要的是，這件盤連貫起子仲姜盤和晉公盤，是後者內底多圓雕裝飾的設計和工藝的嚆矢。子仲姜盤將圓雕鳥與其他圓雕動物如魚和蛙聚集在一起裝飾盤底，動物皆可旋轉。從盤沿一種動物到盤底多種動物匯聚，從普通裝飾到具有故事性、可玩性，應當是鑄工對既有要素的重新整合，當然也是炫耀其高超工藝技巧、技藝相得益彰的場合。到晉公盤，鑄工明顯繼承了子仲姜盤的思想和功用，在盤底增加了龜和蟾蜍，使底部附飾更加繁密，工藝路線更加曲折，炫技的心態甚至得以均溢於言表。

圓雕蛙飾的淵源雖然還不清楚，但卻從此得到延續。京都泉屋博古館收藏一件蛙蛇紋青銅盤 (編號：彝一一〇)，通高 149、口徑 372 毫米，重 6,800 克，年代被斷在春秋早期，但容庚將其斷在

75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53, note 77.

76 孫華：〈晉侯邦父組墓的初步分析〉，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研究 (八)》(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49-266。張奎、張俊才：〈晉侯墓青銅盤的修復〉，《文物世界》2007 年第 2 期，頁 70-72。

77 丁忠明、周亞、吳來明：〈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 (XCT) 在子仲姜盤製作工藝研究中的應用〉，頁 12-25。



圖 24.1 晉叔友父盤（胡東波先生惠供）



圖 24.2 晉叔友父盤底蛙（韓炳華先生惠供）



圖 24.3 晉叔友父盤底（韓炳華先生惠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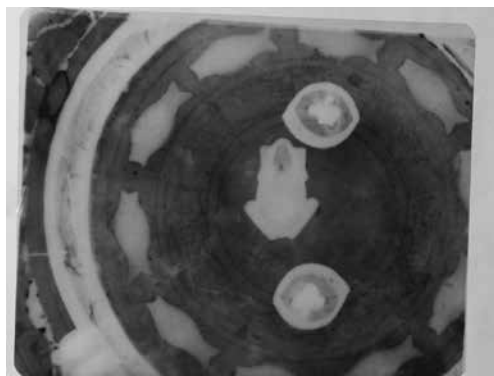


圖 24.4 晉叔友父盤 X 光片（胡東波先生惠供）

西周早期。<sup>78</sup> 此盤大口，腹較深，斜平沿，方唇；鼓腹外壁飾勾連 S 紋帶，上下均有較粗的凸弦紋作邊，兩側對置附耳，內側平而外側鼓。高圈足素面，上段壁直而下段向外弧撇，再直折出立裙（圖 25.1）。內底中央飾一浮雕游水蛙，周圍填飾鳥首紋；自蛙褶下飾一條逆時針盤卷的蛇紋，頭小，四列鱗紋構成蛇身，外周以窄帶。蛇紋外一圈較寬紋帶由十三組紋構成，每組都是半邊水渦、半邊放射性，且兩兩成組，容庚稱之為水藻紋，但可能是鳥尾。腹內壁飾鳥頭紋帶，下邊有素帶作邊，以點紋帶與「鳥尾紋帶」區隔（圖

78 泉屋博古館：《泉屋博古——中國古銅器編》（京都：泉屋博古館，2002 年），頁 114，No. 137。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41 年），頁 461，附圖 830；稱其為蛙藻紋盤，腹飾竊曲紋帶。



圖 25.1 泉屋蛙蛇紋盤（引自《泉屋博古—中國古銅器編》頁 114）



圖 25.2 泉屋蛙蛇紋盤（引自《泉屋博古—中國古銅器編》頁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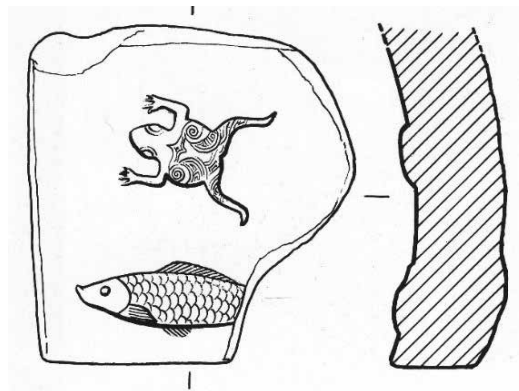


圖 25.3 侯馬蛙紋模（引自《侯馬陶範藝術》頁 357 圖 810）

25.2），鳥頭紋可能與鳥尾紋組成整體，但數目出入較大；或者蛙周圍填飾的鳥頭與之組配也有可能。

蛙紋少見，構圖程式不明。在侯馬鑄銅遺址中，出土了與此盤姿態一致的游水蛙紋模，但與魚紋搭配（圖 25.3），<sup>79</sup> 相信還有更多的蛙紋飾青銅器存在。

#### 四、早期青銅盤的圓雕鳥形附飾

商周青銅容器最大一個特點，也是與其他古代文明一個根本區

7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陶範藝術》，頁 357，圖 810。

別，即其非實用性，或者說非日用性。無論是古怪的造型，還是詭譎的紋飾都表明了這一點。某些兵器、車馬器也是如此。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青銅容器，已經奠定了這一格局。當然，這一現象也蘊含和說明，青銅容器具有某種非凡的功能。

這種特質在此後的發展歷程中，數量方面總體呈現出持續增長，相應的，品質方面雖然參差不齊，但趨勢是朝複雜、奇麗、大型化發展。

複雜化取向在二里頭晚期器已現端倪，二里崗時期青銅容器的犧首飾和扉棱裝飾，逐步被確定。在中商的南方青銅器中，圓雕鳥成為富有特色的裝飾。<sup>80</sup> 本節討論這一裝飾在青銅盤上的表現。

#### （一）商至西周青銅盤的圓雕附飾

中商時期將盤的裝飾導向盤內，都是平鋪的型式，即使是晚商早期，風行高浮雕三層花風格，盤內紋飾也只是浮雕和平鋪結合而已。很明顯，盤的裝飾自有格局，是不同器類採用不同裝飾風格的典型，可能與功能和呈現有關。

平谷劉家河商墓出土兩件盤，在早期墓葬中十分特殊。其中一件青銅盤通高 205、口徑 380 毫米，寬斜沿外折，緊貼沿外邊相對立兩短柱，柱頭各伏臥一隻圓雕鳥。鳥頭大而頸細長，三角形短喙斜向下，身略豐滿。盤弧壁淺腹，底面中央飾龜紋，腹內壁均布三組魚紋（圖 26.1-2），外壁光素。盤下以高圈足相承，其上半均布三個近乎長方形大透孔，下半平鋪斜角目紋帶，近底沿有略為加厚的裙邊。<sup>81</sup> 盤的年代為中商時期，不僅是盤附飾圓雕動物的開始，而且與南方風格青銅器有關聯，不排除鑄造於南方作坊的可能。<sup>82</sup>

殷墟早期青銅工業的突然繁榮，青銅盤裝飾的變化突出體現在內底以繁密盤龍紋、內壁以魚、鳥、獸組合紋帶為特徵，圓雕

80 蘇榮譽：〈技術傳統與藝術表現：論商代飾圓雕型鳥鈕諸青銅器〉，「跨越與超越——藝術史與博物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博物館：2022.8.6-7。

81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文物》1977 年第 11 期，頁 1-8，圖 5、8、9。《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四卷，圖 175。

82 蘇榮譽：〈商前期青銅盤研究〉，《故宮學術季刊》，即刊。



圖 26.1 平谷劉家河盤（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4 圖 176） 圖 26.2 劉家河盤面（王顯國先生惠供）

鳥形附飾僅見於三件盤。巴黎基美博物館收藏一件青銅盤（編號：MA5643，圖 27.1），通高 150、口徑 350 毫米。任淑蘭（Maud Girard-Geslan）的圖錄將其年代斷為商晚期，西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紀。<sup>83</sup> 此盤敞口，淺腹，寬沿，方唇。外腹飾夔紋帶由三個半圓雕犧首與兩側的夔紋構成，細密雲雷紋襯底，紋帶上下以圓圈紋帶鑲邊。高圈足直徑較小，顯得盤徑頗大。圈足上段飾三組獸面紋構成的紋帶。獸面紋中間窄矮脊棱兩側對稱排布變形夔紋，以細密雲雷紋襯底，兩側以開口向外的 G 紋鑲邊，頗為特殊。圈足下段外撇，並直折出較高立裙。盤口沿均布六隻圓雕伏臥鳥。盤腹內壁飾一周陰線紋帶，由三組魚紋、獸紋和鳥紋魚貫構成。內底飾一陰線龜紋，方頭尖吻，圓蓋長尾，兩前爪平行前伸，兩後爪伸向兩側劃水，蓋中兩行六個圓圈，周圍十二個圓圈。前爪兩側鑄銘：「旅」，兩銘同字異構，避免單調（圖 27.2），<sup>84</sup> 頗見匠心。

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的旅盤（藏品號：B60 B1001，圖 27.3）與基美盤相若，高約 140、口徑約 350 毫米，都鑄銘「旅」，應同時鑄造，但盤內紋飾可與中商盤銜接，遠遜色於婦好盤，其年代在中商與殷墟過渡階段，或為殷墟初期。神戶白鶴美術館的龍紋盤（圖

83 Maud Girard-Geslan, *Bronzes Archaiques de Chine*, 144–47.

84 釋文請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嚴志斌教授，同字異構也是他的高見，特此致謝。





圖 27.1 基美旅盤（引自 *Bronzes Archaiques de Chine*, 圖 27.2 基美旅盤內底（引自 *Bronzes Archaiques de Chine*, P146）



圖 27.3 三藩市旅盤（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3 圖 177） 圖 27.4 蟠龍紋盤（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3 圖 176）

27.4），通高 133、口徑 307 毫米，<sup>85</sup> 內壁繁麗，具有典型的晚商早期特徵，可與婦好盤媲美。三件盤沿上都裝飾六隻圓雕鳥，同向伏臥在沿上，姿態與平谷劉家河盤的兩隻鳥接近，但直接伏臥在盤沿，而非臥在柱頭。這樣的裝飾可能具有偶然性，是某工匠與其徒弟的先後作品，故目前僅見三例。

## （二）、西周圓雕附飾器

西周時期裝飾圓雕鳥飾者，除蓋鈕另可討論外，可論者是一件西周晚期方鼎。

85 白川靜（Shirakawa Shizuka）監修：《白鶴英華——白鶴美術館名品図録》（神戸：白鶴美術館，1978 年），頁 58-59。《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三卷，圖 176-177。Lefebvre d'Argencé,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52-53.

1979年在陝西扶風齊村陂塘一灰窖中出土一件青銅四鴨方鼎（編號：79.931）和三件車馬器。鼎甚小，通高119、口101×73、腹深39毫米，重645克。<sup>86</sup> 鼎腹部為長方體，寬折沿內出，方唇外出，羅西章推測「原有形似兩扇門的平蓋」，早佚。腹壁直，外飾上、下兩行垂鱗紋，雙線均寬，且浮凸於器表。兩行鱗紋交錯平鋪。平底外面有長方塊紋飾，構圖奇特（圖28.1），曹瑋以為是變形夔紋，但可解析為兩層相疊，上層若變形目紋，下層僅在右下和左上對角露出同樣目紋的長鱗。鼎底四角各具板狀夔形足撐持。板足依長邊而設，較為別致，面向外側，環形眼突出，張口不透空，後頸出角形大鱗，身窄細，腹側平直垂地後向上捲，魚尾形尾回勾，與鱗間多不透空，外側勾隨形邊線，內側平素。視覺上其外側有若勾牙式扉稜，而足根內側與底部的圓弧過渡，可避免凝固熱應力集中並產生裂紋。

沿口四角所飾圓雕鳥，形似鴨，伏臥在短立柱上，姿態基本一致，作對角線相對鳴叫狀（圖28.2）。喙粗，眼珠突出，以一條C形或雲形勾線表示一對小翅膀，使鳥身顯得肥碩，長尾略突出，下身不平。羅西章明確指出鴨可繞柱轉動，構思巧妙但做工較為粗糙。

就現有資料看，商代的榫接式和鉚接式鑄接工藝，在西周早期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方面強調了渾鑄，以活塊模範代替了某些鑄接，整體性更強，如陝西寶雞竹園溝伯格尊BZM7:8、卣BZM7:6和BZM7:7等；另一方面，一些長頸犧首採用了焊接方式結合，如湖北隨州羊子山噩侯墓出土的神面紋尊和卣等。但絕大多數複雜器形的附飾，依然採用傳統的榫接式鑄接成形，<sup>87</sup> 鉚接式近乎消失。四

86 羅西章：〈扶風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頁6-22、53，圖29.3-4。曹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第十卷，頁2045-2047。《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五卷，圖16。

87 蘇榮譽：〈從國銅器看西周早期青銅冶鑄技術對殷商的繼承和發展〉，收入氏著：《磨戟——蘇榮譽自選集》，頁117-140。蘇榮譽：〈隨州羊子山出土神面卣風格和裝飾的源流與工藝〉，收入上海博物館編：《漢淮傳奇——噩國青銅器精粹》（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1年），頁226-242。蘇榮譽：〈特殊角形獸面和犧首裝飾的青銅器探論——兼論提梁華麗型的青銅卣〉，《考古與研究》第十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年），頁369-416。



圖 28.1 四鴨扁足方鼎（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5 圖 16）



圖 28.2 四鴨扁足方鼎鴨飾拓本（引自《周原青銅器》頁 2016）

鴨鼎的鑄接，雖然屬於榫接式，但柱與鴨是套接關係，目的使鴨可旋轉。這是一種為新表達而採納的新工藝，表現的旨趣在於好玩。<sup>88</sup>

### （三）春秋早、中期圓雕鳥飾器

圓雕鳥飾再現青銅盤沿，目前僅見於 1930 年江蘇儀徵破山口出土的一件盤。通高 270、口徑 880、圈足徑 630 毫（圖 28.3）。敞口，平沿，厚方唇，外弧腹壁，僅上腹飾一周綉紋，凸出如箍；中腹對置  $\cap$  形附耳，耳頂高於綉紋低於唇。淺腹，底平；素面矮圈足，因此外壁輪廓為 S 形；圈足下為較高的立裙。盤口沿均布四隻圓雕鳥飾，鳥伏臥在沿上豎立的方形矮柱頂端，但鳥的下腹圓鼓，與柱頂弧面相接，鳥爪未予表現。鳥昂首向前，方向一致向右，頭小，三角形喙短粗，眼圓睜，頭頂起向後的冠，腦後垂勾形長翎（圖 28.4）。關於破山口器群和這件盤的年代有不同意見，多以為屬西周器。<sup>89</sup> 但諸多現象指向破山口器群出自窖藏，各器年代不一，根

88 張亞初：〈殷周青銅鼎器名、用途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273-315。

89 王志敏、韓益之：〈介紹江蘇儀徵過發現的幾件西周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第 12 期，頁 31-32。張敏：〈破山口青銅器三題〉，《東南文化》2002 年第 6 期，頁 46-63。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第七卷，頁 75。



圖 28.3 儀徵破山徵（引自《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卷頁 75）



圖 28.4 儀徵破山盤（引自《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卷頁 75）

據前揭同出的一件復古風格春秋早期盤，這件盤的年代也應同時。有趣的現象是，自中商的平谷劉家河、到安陽殷墟早期、再經扶風齊村方鼎的轉承，青銅器的圓雕鳥附飾斷斷續續，具有和其他類型裝飾的可比性。<sup>90</sup>

## 五、早期青銅弄器與玩好性青銅器

在青銅器製作中，鑄工的創作欲和創造性，有時會表現出抑制不住的活躍，雖然迄今對於商周青銅器生產和組織、鑄工的角色和利益關係一無所知，對青銅器生產的目的認識雖有深化和突破，還有待取得共識。青銅器的玩味性在既往是完全被忽視的。

據銘文，在商周青銅器中，有一類器物為自銘弄器。

最早關注弄器的學者首推徐中舒。他考察古代狩獵圖像及其銅器，提出「獵器即古代之弄器」。認為「現存獵器，均有白色物質之鑲嵌。……此鑲嵌之銅器，即古代上層階級或王公貴人之弄器。」

90 蘇榮譽：〈論圓雕鳥飾沿青銅盤——兼論商周青銅器裝飾的連續與間斷現象〉，待刊。

所據器為杵氏壺，詳見下文。徐氏明確指出「弄即玩賞之意」，並稽考文獻，認為「弄器為古代工藝中最高級作品」。<sup>91</sup>

此後，張亞初搜集弄器，指出「弄器則是玩弄之器」，《說文》「玩，弄也」；《爾雅·釋言》：「弄，玩也」；二者互訓。<sup>92</sup>顯然，他們認為弄器是高貴、精美的玩器。

二十世紀末，巫鴻在討論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時，對青銅器的「紀念碑性」進行研究。他與九鼎故事相對照，指出在青銅時代末期，「禮器的製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奢侈品的製造所替代。在強大的地方統治者的贊助下，一種奢靡的藝術風格成為時尚，紀念性的銘文不再流行，青銅器上的文字標明這些器具是嫁妝或『弄器』」。<sup>93</sup>用奢華器和弄器的出現反襯衰落的青銅器「紀念碑性」傳統。其實，華麗性或複雜化一直是二里頭到商前期的基本趨勢，雖然殷墟中晚期似乎有短暫的簡單化階段，但西周早期，——周公制禮階段，奢侈化的器物為數不少，而且不少有堂而皇之的銘文，何尊即是一例。<sup>94</sup>這裡，先解剖若干考古資料再作簡單討論。

### （一）商與西周時期

1976年，在對安陽小屯遺址的調查發掘中，清理出地穴房屋一座，附有祭坑和灰坑各一個，祭坑中發現一個青銅器蓋 F11:12，作長方形，長 63、寬 52 毫米；中部隆起，中央設鈕，兩端各有對稱的長方形缺口，器應為方鼎蓋，其周緣飾四組夔紋。蓋背面鑄銘一行四字：「王乍姪弄」（圖 29.1）。發掘報告指出，「弄」即弄器，玩器，銘文意為王為姪姓婦女作弄器。<sup>95</sup>黃銘崇對比研究確認此器為方

91 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頁 577-578。

92 張亞初：〈殷周青銅鼎器名、用途研究〉，頁 273-315。

93 巫鴻：《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頁 52-92。

94 蘇榮譽：〈特殊角形獸面和犧首裝飾的青銅器探論——兼論提梁華麗型的青銅卣〉，頁 369-416。

95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75 年安陽殷墟的新發現〉，《考古》1976 年第 4 期，頁 264-272、263，圖 1 下、圖 2。

鼎蓋，但感於尺寸之小，認為「像是扮家家酒用的玩具」。<sup>96</sup>但張亞初稱其為方觶蓋，不知何據，還進而指出王為帝辛，姪為其妻（邱氏之女）。殷王為他妻子所作的一件玩弄器物。<sup>97</sup>

1987年，在安陽郭家莊東南殷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銅簋 M1:16，通高 106、口徑 142、圈足徑 105 毫米，侈口束頸，鼓腹下接圈足，兩側對設鑿形獸耳。頸部紋帶在高浮雕犧首兩側布置與變形夔相間的渦紋，圈足飾三組獸面紋組成的紋帶（圖 29.2），底部鑄銘四字「鳥黻弄彝」。墓葬年代為殷墟晚期。<sup>98</sup>

陳夢家曾著錄一件商晚期王作弄卣，係紐約乃布氏（Arnold Knapp）藏品。這是一件提梁卣，通高 202、寬 130 毫米，卣腹截面為橢圓形，隆蓋具有高蓋裙，中央設瓜棱形鈕，頸部、圈足、和蓋緣飾鳥紋帶，腹部和蓋中飾瓦棱紋。帶狀提梁橫置，兩端有較大的獸頭。蓋、器對銘四字：「王乍姪弄」（圖 29.3）。陳夢家推斷此器年代屬殷代，銘文中王應是殷王，第三字疑為后妃之姓。弄即弄器。<sup>99</sup>小屯出土方鼎蓋銘文與之相同，發掘報告認為係一人同作器。<sup>100</sup>黃銘崇對陳夢家的說法做了修正，按照商人女性命名通例，姪非其姓，而應是受器者的私名或國名加女字旁。<sup>101</sup>張亞初結合前述器蓋，也認為「同時所製作的弄器應該有一套」。<sup>102</sup>但他們並沒有指出如何把玩這些弄器。

可見商代自銘為「弄器」者，多形小（也未必都十分小）。小器可以把玩，但需精緻。如王乍姪弄方鼎蓋、王作弄卣、鳥黻弄

96 黃銘崇：〈殷代及東周之「弄器」及其意義〉，《古今論衡》2001年第6期，頁66-88。

97 張亞初：〈殷周青銅鼎器名、用途研究〉，頁273-315。

9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87年夏安陽郭家莊東南殷墓的發掘〉，《考古》1988年第10期，頁875-881，圖3.4。《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二卷，圖97。

99 陳夢家：《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北京：金城出版社重排本，2016年），中卷，頁1284-1285，A560。

100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75年安陽殷墟的新發現》，頁264-272、263。

101 黃銘崇：〈殷代及東周之「弄器」及其意義〉，頁66-88。

102 張亞初：〈殷周青銅鼎器名、用途研究〉，頁273-315。



圖 29.1 小屯器蓋 F11.12 銘文。殷墟青銅器 f88.7 (引自《殷墟青銅器》圖 88.7)



圖 29.2 鳥紋簋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2 圖 97)

簋，在殷墟青銅器中過於普通甚至略顯粗糙。它們既不似徐中舒、巫鴻所言的極品或奢華器，與黃銘崇所言「屬於主人最貼身、最喜好的，是規範以外的」弄器，也應有相當的距離。應否把它們視為把玩之物，還缺乏考古學證據。殷代的這些弄器，顯然與巫鴻構建的青銅器的紀念性不協調。

按照張亞初的意見，雖然從銘文不能確定西周時期弄器，但他指出嬴德小鼎應是弄器，因為形小。<sup>103</sup> 由此可以瞭解張氏的弄器判據。李零指出：「弄器可能包括很多小器物，但小不一定是絕對標準。他搜集了盛玉器的小銅方盒、盛脂粉的小銅罐、盛梳子的小銅圓盒，均出自女性墓，結合古文獻，並根據河南三門峽虢季夫人墓



圖 29.3 卣 (引自《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A560)

103 同上注。

出土的梁季罐 M2012:92 銘『櫝』，為這類銅器定名。」<sup>104</sup>

以上器物與玩好關聯較弱。事實上，商代和西周確有幾件具有玩味性質的器物。

鄭州向陽回民食品廠窖藏出土的一件中柱盃 XSH1:6，通高 120、口徑 295 毫米，盆形底中央起立柱，上粗下細，頂有傘狀柱帽，飾渦紋（圖 30.1）。<sup>105</sup> 玩物的取向已清楚顯露。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掘的安陽西北岡大墓 M1005，出土了兩件一對被稱之為中柱旋龍青銅盃 R1089 和 R1090，R1089 通高 157、腹深 127、口徑 257 毫米，重 5,060 克，容 3,460 毫升。盃形器底豎立中空柱並具有六瓣花形柱頭，四隻昂首平視青銅龍結成環狀套在柱頭之下，可繞柱旋轉（圖 30.2-4）。<sup>106</sup>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陳夢家（1911-1966）應梁思永（1904-1954）之約整理安陽發掘青銅器，指出盃正中有軸，軸上安置四個牛頭（按即龍），可以旋動，其用途不詳。<sup>107</sup> 毫無疑問，這兩件盃並非禮器，而是玩物。其鑄造工藝頗為複雜，分多件、多次鑄接而成。具體部件包括雙耳、盃、中柱和旋龍。按照萬家保的復原，先鑄旋龍，次鑄造中柱與旋龍套接，在澆注盃時與中柱鑄接，最後分別鑄接雙耳於盃腹。<sup>108</sup>

十分特別的是兩件盃的雙耳採用鑄鉚式後鑄的型式，這種鑄法於商早期二里崗階段發明於南方鑄銅作坊，是某支鑄工的秘技，為少數鑄工掌握，傳承路徑清晰。直到武丁時期毀卻南方鑄銅作坊，

104 李零：〈說匱——中國早期的婦女用品：首飾盒、化妝盒和香盒〉，《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 年第 3 期，頁 69-86。李零：《萬變——李零考古藝術史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16 年），頁 21-5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地（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頁 251。

10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頁 823-824，圖 554.4，彩版 38.2。

106 李濟、萬家保：《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五本）（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 年），圖版 10-11、53.5-6。《中國青銅器全集》，第三卷，圖 179。

107 陳夢家：〈安陽西北崗陵墓區的銅器〉（《殷代銅器三篇》之一），《考古學報》1954 年第 7 期，頁 25。

108 李濟、萬家保：《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五本），圖版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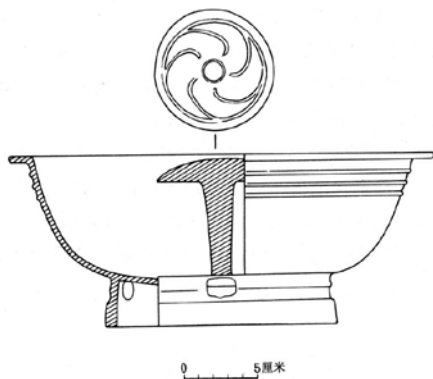


圖 30.1 鄭州向陽回民食品廠窖藏中柱盃  
XSH1:6 (引自《鄭州商城》彩版 38.2)



圖 30.2 殷墟四龍盃 (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  
卷 3 圖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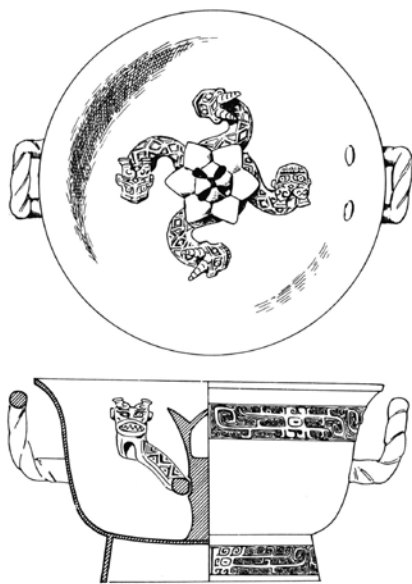


圖 30.3 殷墟四龍盃 R1089 (引自《殷墟出土伍  
拾三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圖版 53.5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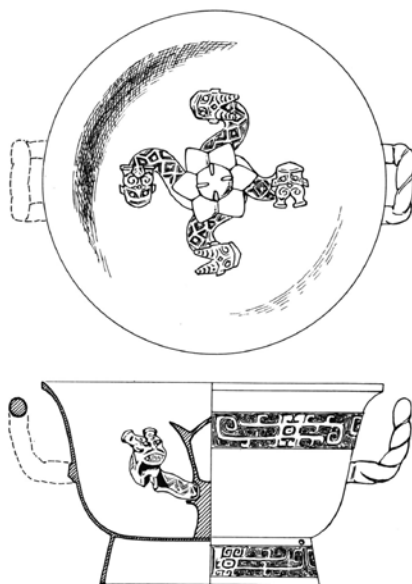


圖 30.4 殷墟四龍盃 R1090 (引自《殷墟出土伍  
拾三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圖版 53.6a-b)

遷其鑄工至大邑商殷墟，造就了晚商早期青銅工業的突然繁榮。這些鑄工將南方青銅器風格和工藝帶到殷墟繼續生產，這對盃即是他們的作品。<sup>109</sup>

西周早、中期玩好青銅器還有待梳理，具銘的是兩件「田尹作元弄」鈕鐘，朱鳳瀚認為年代屬西周晚期。<sup>110</sup> 它們的性質與商代銘

109 蘇榮譽：〈安陽殷墟青銅技術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鉚結構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博古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頁 352-386。

110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364。

為弄器者相承，與玩好器有相當距離。而這一時期的晉叔友父盤和四鴨方鼎應是玩味濃厚的器物。四鴨方鼎四角的圓雕鴨飾可繞軸旋轉，晉叔友父盤內底中心圓雕蛙飾與盤沿爬龍張力滿滿，讓附飾動或欲動的設計理念與安陽出土中柱盂如出一轍，具有強烈玩好性。

## （二）春秋

張亞初搜集具銘弄器，有如下七件：君子之弄鬲、君子之弄鼎、智君子之弄鑿（兩件）、子之弄鳥尊、杻氏弄壺和君子之小口弄壺，並認為這些器都是東周時期東周和三晉一帶的器物。但平王東遷之後，王室是否鑄器大成疑問，將之歸晉或三晉更可圓通。他歸納「作弄器似乎是這個時期這一地區的習俗愛好」，也是金文家之言，因為不鑄銘青銅器的數量遠遠超過有銘器，山西太原趙卿墓、河南輝縣琉璃閣甲乙墓絕大多數青銅器都無銘文，其中的弄器頗難甄別。所以他也承認「實際上弄器是不少的，而其起源是很早的。」<sup>111</sup> 稱年代早或指商代的弄器。據張氏搜集，晉國青銅器當有弄器一類。

1958年，故宮博物院購藏一件君子之弄鬲，傳出自河南輝縣。通高140、寬184、口徑150毫米，重1,760克。圖錄認為其年代為戰國前期。<sup>112</sup> 這件器斂口，鼓腹，腹底為聯襠式，下接三個矮蹄足。上腹飾長方形綉紋帶兩周，兩側對置飾綉紋的方附耳。隆蓋飾相同的紋帶，另有三個環扁鈕。口沿鑄銘五字：「君子之弄鬲」（圖31.1）。另有一件「君子之弄鼎」傳出土於河南輝縣，收藏於吉林大學。球形深腹，失蓋，故可見口沿內出子口。口沿下對設兩方附耳，腹下三蹄足承器。通高220毫米，銘文作「君子之弄鼎」（圖31.2），李零指出「君子」是智君子的省稱，前邊的鬲亦是。<sup>113</sup>

華盛頓弗利爾藝術館即收藏的一件鳥尊和一件鑿均銘弄器。鳥

111 張亞初：〈殷周青銅鼎器名、用途研究〉，頁273-315。

112 故宮博物院：《故宮青銅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頁270。

1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4冊，頁161，No. 02086。  
李零：〈說匱——中國早期的婦女用品：首飾盒、化妝盒和香盒〉，頁69-86，收入氏著：《萬變——李零考古藝術史文集》，頁2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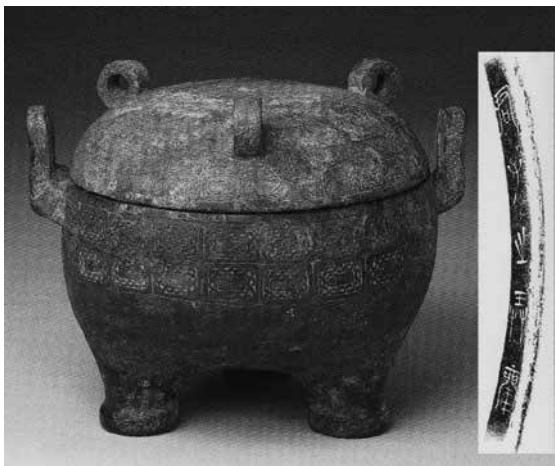


圖 31.1 君子之弄鳥（引自《故宮青銅器》頁 270）



圖 31.2 君子之弄鼎銘文（引自《殷周金文集成》02086）

尊（編號：61.30）傳出太原，後為邁耶夫婦（Mr. and Mrs. Eugene Meyer）收藏，並捐贈給弗利爾藝術館。鳥尊通高 265、寬 228 毫米。造型為猛禽，昂首挺胸，中空；頭分開鑄造，以榫卯結合；大而尖利的喙可以開合，上半鉸接於鳥頭。鳥頭飾羽紋、回紋和點紋，頸部飾變形夔紋內填回紋，肩部飾夔龍紋，北部飾高浮雕羽紋，腹部飾鱗紋和夔紋，足部飾雲紋，尾下似失去一個支撐（圖 32.1）。鳥冠頂鑄銘四字「子作弄鳥」，子是智君子的簡稱，錯金；鳥眼圓睜，眼珠錯一圈金絲、中間錯一金圓點以表現瞳孔。<sup>114</sup>

另一件是智君子鑿（編號：39.5，見圖 32.2），傳出河南輝縣，通高 227、寬 518、底徑 230 毫米。大口微斂，深腹，寬平沿，後方唇外出，飾一周貝紋。頸收束，鼓腹，下腹內收出平底，

114 陳夢家：《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下卷，頁 1632-1635，A674。John A. Pope, et al,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 Catalogue*, 478-83. 經對右足下採樣濕法分析，期化學成分含銅 74.1%、錫 13.6%、鉛 10.8%；對尾梢採樣濕法分析，化學成分分別為 71.8% 銅、12.8% 錫、13.7% 鉛。《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八卷，圖 54。

其下接矮圈足。頸部和下腹均飾夔鳳紋帶，中腹飾獸面紋帶，頸與中腹、中腹與下腹間及圈足飾辮紋帶。頸與上腹相對而設兩對獸耳，一對銜圓環而另一對無，紋飾細密嚴格。內壁鑄銘一行六字：「智君子之弄鑿」，唐蘭稱其書體為韭葉篆（見圖 32.3），李零認為「智君子」為「智君之子」。<sup>115</sup> 皮斯柏（Alfred F. Pillsbury, 1876–1950）曾收藏一件同樣的鑿，具有同樣的銘文，現藏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B. Keyser 做過對比研究，出自同組鑄工之手。<sup>116</sup>



圖 32.1 子乍弄鳥尊（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8 圖 54）

據容庚圖錄，杅氏壺通高 378 毫米，排在春秋戰國時期。小口微侈，束頸，頸下肩不明顯。自肩以下設三道帶狀箍，將壺腹分上、中、下三段。肩下之箍，在兩側對設五邊形環耳，並與提鏈連結（圖 32.4）。<sup>117</sup> 中腹之箍，高於最大徑約二十毫米，其上鑄銘一周可韻讀曰：「杅氏福我，歲□鮮於，□是□□，虞台為弄壺。曰頌

115 陳夢家：《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下卷，頁 1632–1635，A674。John A. Pope, et al,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 Catalogue*, 568–73。對圈足底沿採樣，經濕法分析，含銅 70.8%、錫 12.8%、鉛 14.7%；對於銘相對的耳取樣濕法分析，含銅 69.2%、錫 14.3%、鉛 14.2%。《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八卷，圖 96。唐蘭：〈智君子鑿考〉，《輔仁學志》第七卷第一二合期，頁 101–112；唐蘭：《唐蘭全集》（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584–592。李零：《說匱——中國早期的婦女用品：首飾盒、化妝盒和香盒》，頁 69–86；李零：《萬變——李零考古藝術史文集》，頁 21–51。

116 Bernhard Karlgren, *A Catalogue of the Bronzes in the Alfred F. Pillsbury Collection* (Minneapolis: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1952), 138–39. Barbara Keyser, “A Technical Study of Two Late Chou Bronze Chie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and Artistic Works*, Vol. 13, No. 2 (1973): 50–64.

117 梅原末治 (Umehara Sueji)：《戰國式銅器の研究》（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6 年），圖版 85。

既好，多寡不籲，虞台匿飲酉，於我室家。罔口勿後，甯在我車。」下腹之箍光素。矮圈足上有一寬大箍，或為瓣形，圖片莫辨。口上有隆蓋，下出子口插入壺口，中設半環鈕，有鏈連接提鏈。蓋面、頸上部和下腹，覆有深淺不同的鏽層，或者是當時的彩繪，變色或褪色黏附器表。頸下段即肩部、上腹和下腹，容庚僅指出錯狩獵紋，但不言錯以何種金屬；徐中舒指出壺的陰文圖像中「嵌入」白色物質，認為《詩·小戎》之「鍔」即此，<sup>118</sup> 也不明就裡。

杅氏壺造型普通，所稱弄器或許與壺表面的「鑲嵌」畫像和彩繪有關，或許只是籠統的溢美，因為精美如子仲姜盤、複雜如晉公盤、華麗如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和隨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精美器物中，並不見以「弄器」稱讚。

上述器物都具有侯馬風格，多屬晉卿智氏。智氏覆滅於公元前453年，這些器物年代應早於此，當在侯馬鑄銅的盛期。晉國鑄器吝於鑄銘，但這批器銘稱弄器，可見侯馬鑄銅中，弄器為數不少。

但這些弄器，除鳥尊、鑿和杅氏壺裝飾華麗外，鼎和鬲都很普通，表現不出好玩或者可把玩性。與商周自銘弄器者相同，看來弄器或別有其他含義。

與這些弄器相比，春秋早期的子仲姜盤將圓雕鳥與圓雕魚、蛙聚集一起設置在盤底，動物均可旋轉。從早期盤沿裝飾圓雕鳥到盤底與多種動物匯聚，使之具有故事性、可玩性，反映了鑄工對既有要素的重新整合，以炫耀其奇思妙想、高超鑄接技巧、技藝相得益彰。晉公盤中增加了更多動物，如龜和蟾，使底部附飾更加繁密，工藝路線更加曲折，炫技的心態甚至得色溢於言表。可見它們是玩器，與商代玩器異曲同工。

118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下冊，頁406，附圖769。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收入《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頁588-590。此為徐氏多年釋文，此後釋文可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第15冊，頁258，No.09715。



圖 32.2 智君子鑿（引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卷 8 圖 96）



圖 32.4 杙氏壺（引自《戰國式銅器的研究》圖版 86）



圖 32.3 智君子鑿銘文（引自《殷周金文集成》10288）

## 六、結語

東周早期的子仲姜盤和中期的晉公盤，是兩件裝飾華麗、工藝精妙的傑作，而且具有緊密關聯，表現出相同的裝飾風格和功能意趣。繁複而可動的附飾，具有清楚的玩好性，二者同是王侯玩具。

東周的社會巨變對青銅器生產的影響，既往學者多從禮崩樂壞、將青銅器作為禮器載體的角度研究。宗法社會禮制至為重要，但禮制並不等於禮器，禮器如何反映禮制也只較多地見於戰國才出現的某些零星文獻，所涉及的青銅器種類遠遠少於考古發現的事實。從侯馬鑄銅遺址的發現可知，青銅器生產的大宗和主體是貨幣、生活用具、飾品及兵工器具，容器佔比不高，但和主流產品同

屬商品生產，持續的時間也只有百來年。<sup>119</sup> 很明顯，需要對青銅器的功能重新認識。

侯馬鑄銅遺址特別強調貨幣生產和器物製作的經濟性，雖然商代和西周的青銅器生產的組織和目標目前還不清楚，但侯馬青銅生產逐利目的十分強烈，這可能是春秋世變的必然結果。

從這一方面看，毫無疑問可以稱那個時代為「禮崩樂壞」。明顯的事實是，這場變革湧現出大量新貴，他們沒有約束，和世家王公一道窮奢極欲，在青銅器上表現出一批極盡奢華之能事的作品。不僅「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尚書·泰誓下》），如子仲姜盤和晉公盤均是父親為女兒作器，更是為張大自己而極盡能事。太原金勝村趙卿墓、隨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和平山三汲中山王譽墓出土的器物都是證明。

當然，精美的器物依賴高水平的工匠製作，極致器物需要頂尖級工匠的創意並完成，人才匱乏在任何時代都是難題，高水平工匠也是如此。文獻可見春秋戰國名士奔走投向明主，也偶有王公貴族豢養特殊機巧工匠，制器須三年之久者：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髻莢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狀之備具。周君大悅。（《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宋人有為其君以象（引者按：即象牙）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韓非子·喻老》）

目前雖未見到有關鑄工被豢養、雇傭、遷徙或延攬的文獻，也還不知道商周鑄工的社會經濟角色，但他們總是在恪守傳統與不斷創新的張力中過活。不時貢獻出巧奪天工的作品，然而，無論是精品還

119 蘇榮譽：〈侯馬鑄銅遺址與晉國鑄銅業〉，《產業與科技史研究》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1-17。

是普通的凡品，不少器物在諸多方面至今還是謎團。<sup>120</sup>

探索和破解謎團除老實研究外別無他途。而技術手段在不斷進步，當今 CT 掃描技術可以相當清楚地展現器物內部結構。對子仲姜盤的分析，揭示出圓雕動物可以水平旋轉，因此要將多種動物聚在一盤，想像力驚人，執行力超強。所謂藝高人膽大，就是對兼具這兩種能力的讚美。

子仲姜盤的認識確定後，向前可以推知晉叔友父盤，探索設計思想的淵源，向後關聯到了晉公盤。

晉公盤晚於子仲姜盤大約百年，可能相差四代工匠，是否中間還有類似作品，可以期待。儘管晉公盤做工相對粗糙，但鑄工明顯有超越子仲姜盤的欲望，可以感知鑄工發雄心要鑄造一件最複雜的玩盤，設計了更為繁多的動物，並使鳥喙能開合、鰲頭可伸縮，還要承載長篇銘文。其野心與工藝上的別出心裁相輔相成，不似子仲姜盤直接地鑄接立柱，而是以鑄焊的方式完成結合。工藝上的非邏輯性和非經濟性，卻也是這類鑄工藝術家的稟賦，所以創造出不朽的傑作。

從這兩件盤尋繹春秋早、中期青銅藝術和技術，不僅可以洗脫春秋早期衰頹低點的印象和概觀，而且的確發掘出創造的野心和活力，其中是否蘊含著通向「禮崩樂壞」的力量還不能明確，但導向奇珍異玩之途是可以肯定的。在這條路上，鑄工的奇技淫巧被大大激發，產出巧妙的發明和多種工藝的集成，成為春秋晚期青銅藝術與技術再臻鼎盛的基礎。

因此，還有諸種理由期待更多、更新奇器物的發現，包括介於子仲姜盤和晉公盤之間的盤或相關器物。而作為處在孕育新興期、春秋中期的一件代表作，工藝上將雙耳、全部圓雕附飾分鑄鑄接、三足分鑄焊接，與春秋晚期即新興期青銅器生產的技術路線和工藝

120 蘇榮譽：〈塊範法與中原失蠟法〉，頁 93-183。蘇榮譽：〈商周青銅鑄造泥模範的七個問題〉，收入丹羽崇史編：《对照実験を主軸とした》，頁 40-59；《南方文物》2020 年第 3 期，頁 235-244。



風格完全一致，<sup>121</sup> 就此可以說，春秋中期複雜器物的鑄造工藝，被接納到春秋晚期大批量流水線式的生產格局之中，成為新興期的一個技術源頭。

需要說明的是，子仲姜盤與晉公盤之間的過渡器物可遇而不可求。因為鑄工製作這類青銅器往往單件，很少成組，體現和反映了鑄工的妙思和工巧，往往成為一個時代的代表性作品。巫鴻認為商代青銅器的裝飾，在形式和主題上都強調不斷的「變形」(metamorphosis)，<sup>122</sup> 更多方面是不同鑄工製作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才是鑄工求變的產物。對於青銅器，這樣的作品往往缺乏莊嚴感，遠離莊重而趣味盎然，功能明顯為玩具或者玩物，然後隨葬。本文所論兩件盤都具有這樣的特點。春秋戰國之交的曾侯乙尊盤，則以極盡奢華的失蠟法工藝表現了鑄工的極限挑戰，反映了擁有者的尊崇。那樣的盤用之於承接盥洗之廢水，不可想像，而且與之成組不再是可灌注的盃、匜等容器，而是一件被歸為酒器的尊。當然，尊是否一定屬酒器，或者文獻所載盛酒之尊是否是今天青銅器所歸類者、或者怎樣用，既往人云亦云，未必可靠。

## 附識

此文寫作導於對山西青銅博物館所藏晉公盤的研究。為理解那件複雜極致的青銅盤，作者曾系統地調研了商周青銅盤，發現這類器物嚴重缺乏關注，關於其起源、發展、演變甚至工藝和功能等，多人云亦云，欠缺深入細緻的研究。遂不揣淺陋，分階段、分類型開始匯集材料，分別討論，本文即是其中的一篇。撰寫過程中，山西古建研究院韓炳華研究員和北京大學胡東波教授惠供晉叔友父盤照片和 X 光片、上海博物館周亞教授惠供了晉韋父盤照片、首都博物館王顯國先生提供了平谷劉家河商墓出土青銅盤的細部照片，也

121 蘇榮譽等：《中國上古金屬技術》，頁 157-179。

122 巫鴻：《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頁 13。

曾請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嚴志斌研究員基美旅盤的銘文，請教吉林大學姬英傑博士關於吉林大學藏弄鼎情況，要感謝諸位的幫助。2022年9月16-18日，「曲村 - 天馬遺址發現 60 週年、晉侯墓地發掘 30 週年學術研討會」在曲沃舉行，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晉文化研究所武俊華所長安排，晉國博物館慨允，筆者 17 日抽空親炙友父盤，修正了對該盤的某些認識。校稿過程中，也參酌了匿名審稿者的意見，為新的研究背景增加了部分注釋，在此一併致以深深的謝忱。

榮譽 壬寅年大暑日於北京天通苑  
小雪日三校畢

## 引用書目

- 安徽大學、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 寶雞市周原博物館：《周原莊白西周青銅器窖藏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
-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文物》1977年第11期，頁1-8。
- Bagley, Robert W.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C.: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
- 曹瑋：〈周原西周銅器的分期〉。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研究（二）》（紀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四十周年1952-1992），頁144-165。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年。
- ：〈從青銅器的演化試論西周前後期之交的禮制變化〉。收入周秦文化研究編委會：《周秦文化研究》，頁443-456。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 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第二卷、第十卷。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
- 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 主編：《陝北青銅器》，第一、第二冊。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
- 陳夢家：〈安陽西北崗陵墓區的銅器〉（《殷代銅器三篇》之一）。《考古學報》1954年第7期，頁17-30。
- ：《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北京：金城出版社重排本，2016年。
- 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博物館藏品（東周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The Chinese Exhibition: A Commemorative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Royal Academy of Arts, November 1935-March 1936*.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6.

- 戴應新：〈陝北清澗、米脂、佳縣出土古代銅器〉。《考古》1980年第1期，頁95、70。
- 丁忠明、周亞、吳來明：〈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X-CT)在子仲姜盤製作工藝研究中的應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7年第5期，頁12-25。
- 丁忠明、蘇榮譽：〈晉公盤的鑄造工藝分析〉，《文物季刊》待刊。
- 管文韜：〈試論晉公盤銘文及相關問題〉。《青銅器與金文》第三輯，頁94-1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故宮博物院：《故宮青銅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 郭寶鈞：〈古器釋名〉，《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689-708。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
- 郭沫若：〈青銅時代〉，收入氏著：《青銅時代》，頁297-308。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 Girard-Geslan, Maud. *Bronzes Archaiques de Chine*, Paris: Tresors du Musée Guimet, 1995.
- 韓炳華：《晉西商代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 林巳奈夫(Hayashi Minao)著，廣瀨熏雄(Hirose Kunio)、近藤晴香(Kondo Haruka)譯，郭永秉潤文：《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圖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市博物館：〈鄭州新發現商代窖藏青銅器〉。《文物》1983年第3期，頁49-59。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0期，頁24-42。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 ：《曾國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 黃銘崇：〈殷代及東周之「弄器」及其意義〉。《古今論衡》2001年第6期，頁66–88。
- Keyser, Barbara. "A Technical Study of Two Late Chou Bronze Chie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and Artistic Works* Vol. 13, No. 2 (1973): 50–64.
- Karlgren, Bernhard. *A Catalogue of the Bronzes in the Alfred F. Pillsbury Collection*. Minneapolis: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1952.
- Lefebvre d'Argencé, René-Yvon.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77.
- 李零：〈說匱——中國早期的婦女用品：首飾盒、化妝盒和香盒〉。《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3期，頁69–86。
- ：《萬變——李零考古藝術史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
- 李濟、萬家保：《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五本）。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年。
- 廉海萍、譚德睿、鄭光：〈二里頭遺址鑄銅技術研究〉。《考古學報》2011年第4期，頁561–575。
- 梁星彭、馮孝堂：〈陝縣長安、扶風出土西周銅器〉。《考古》1963年第8期，頁413–415。
-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獼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 羅西章：〈扶風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頁6–22。
-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收入氏著：《中國青銅器研究》，頁355–39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原載於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編：《商周青銅器紋飾》，頁1–3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 ：〈跋子仲姜盤〉。收入馬承源著，陳佩芬、陳識吾編：《馬承源文博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Rawson, Jessica. *Western Zhou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ume IIB,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 Foundation, 1990.
- , *Chinese Bronzes Art and Ritual*, London: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87.
- Pope, A., Gettens, R., Cahill, J., and Barnard, N..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 Catalogue*.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1967.
- 齊文濤：〈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72年第5期，頁3-16。
- 泉屋博古館：《泉屋博古——中國古銅器編》。京都：泉屋博古館，2002年。
- 容庚：《武英殿彝器圖錄》。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4年。
- ：《商周彝器通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
-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阜魯國故城》。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陶範藝術》。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6年。
- ：《侯馬白店鑄銅遺址》。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
- 山西省公安廳、山西省文物局：《國寶回家——2018年山西公安機關打擊文物犯罪成果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周鎬京附近部分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1期，頁1-31。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國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寶雞市考古研究所、眉縣文化館：《吉金鑄華章——寶雞眉縣楊家村單氏青銅器窖藏》。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 白川靜（Shirakawa Shizuka）監修：《白鶴英華—白鶴美術館名品圖錄》。神戶：白鶴美術館，1978年。
- 蘇榮譽等：《中國上古金屬技術》。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
- ：〈從國銅器看西周早期青銅冶鑄技術對殷商的繼承和發展〉。收入氏著：《磨戟——蘇榮譽自選集》，頁117-140。上海：上

- 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 ：〈二里頭文化與中國早期青銅器生產的國家性初探——兼論泥範塊範法鑄造青銅器的有關問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夏商都邑與文化》（一），頁342-37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 ：〈安陽殷墟青銅技術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鉚結構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博古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收入泉屋博古館、九州國立博物館編：《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頁352-386，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
- ：〈侯馬鑄銅遺址與晉國鑄銅業〉。《產業與科技史研究》第一輯，頁1-17。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 ：〈婦好墓青銅器與南方影響——殷墟青銅藝術與技術的南方來源與技術選擇新探〉。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承真樓編：《商周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頁1-68。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年。
- ：〈中國古代泥範塊範法青銅鑄造〉。收入氏著：《中國青銅技術與藝術》，丁酉集，頁1-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凸顯紋飾——商周青銅器填紋工藝〉。《青銅器與金文》第三輯，頁313-3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商周青銅鑄造泥模範的七個問題〉。收入丹羽崇史編《对照実験を主軸とした——東アジア鑄造技術史解明のための実験考古學的研究》，第40-59頁。奈良：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2020年；《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頁235-244。
- ：〈隨州羊子山出土神面卣風格和裝飾的源流與工藝〉。收入上海博物館編：《漢淮傳奇——噩國青銅器精粹》，頁226-242。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1年。
- ：〈塊範法與中原失蠟法——春秋世變下青銅技術的本與末〉。收入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中心：《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特輯二）：中國早期數術、藝術與文化交流——李零先生七秩華誕壽慶論文集》，上冊，頁93-183。杭州：浙江大學出版

- 社，2021年。
- ：〈特殊角形獸面和犧首裝飾的青銅器探論——兼論提梁華麗型的青銅卣〉。《考古學研究》第十三輯，頁369–416。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年。
- ：〈晚商作冊般青銅甗的工藝及相關問題〉。《江漢考古》2022年第1期，頁106–112。
- ：. “Rethinking Beiyao Foundry Site of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at Luoyang,” *Making Economy: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Good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5–771 B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April 1–3, 2022.
- ：〈技術傳統與藝術表現：論商代飾圓雕型鳥鈕諸青銅器〉，「跨越與超越——藝術史與博物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博物館：2022年。
- 、黃鳳春：〈隨州文峰塔青銅爨浣作盤研究——兼論春秋晚期漢水和淮河流域青銅盤的格局〉。《荊楚文物》。即刊。
- ：〈商前期青銅盤研究〉。《故宮學術季刊》，即刊。
- ：〈論圓雕鳥飾沿青銅盤——兼論商周青銅器裝飾的連續與間斷現象〉。待刊。
- So, Jenny. *Eastern Zhou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ume III*.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5.
- 唐蘭：〈智君子鑿考〉。《輔仁學志》第七卷第一二合期，頁101–112；收入氏著：《唐蘭全集（二）》，頁584–59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縣安居出土青銅器〉。《文物》1982年第12期，頁51。
- 孫華：〈晉侯邦父組墓的初步分析〉。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考古研究（八）》。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
- 天理大學、天理教道友社：《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品》。天理市：天理教道友社，1986年。
- 梅原末治（Umehara Sueji）：《戰國式銅器の研究》。京都：東方文



- 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6年。
- 萬樹瀛：〈滕縣後荊溝出土不嬰簋等青銅器群〉。《文物》1981年第9期，頁25-29。
- Wang Quanyu, Chen Yi, and Su Rongyu. “Houma Bronz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 Technical Study.” *Orientalia* November/December (2019): 44-63.
- 王壽芝：〈陝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1988年第6期，頁3-9。
- 王志敏、韓益之：〈介紹江蘇儀徵過發現的幾件西周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2期，頁31-32。
- 巫鴻著，李清泉、鄭岩等譯：《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第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謝青山、楊紹舜：〈山西呂梁縣石樓鎮又發現青銅器〉。《文物》1960年第7期，頁51-52。
- 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河南羅山縣發現春秋早期銅器〉。《文物》1985年第1期，頁51-53。
- 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收入《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569-617。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 張奎、張俊才：〈晉侯墓青銅盤的修復〉。《文物世界》2007年第2期，頁70-72。
- 張敏：〈破山口青銅器三題〉。《東南文化》2002年第6期，頁46-63。
- 張世賢：〈試論中國銅器的製作在西周自鼎盛轉衰頹的緣由——兼論中國開始使用硫化礦煉銅的年代〉。《第一屆科學史研討會集

- 刊》，《科學史通訊》1987年第5期附刊，頁18–28。
- 張亞初：〈殷周青銅鼎器名、用途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頁273–315。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鄭傑祥、張亞夫：〈河南潢川縣發現一批青銅器〉。《文物》1979年第9期，頁91–93。
- 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第七卷、第十九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嶺虢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75年安陽殷墟的新發現〉。《考古》1976年第4期，頁264–272。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5年第5期，頁215–224。
-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全十六卷，第十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1998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259、260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7年第1期，頁99–117。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87年夏安陽郭家莊東南殷墓的發掘〉。《考古》1988年第10期，頁875–881。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小屯村北的兩座殷代墓〉。《考古學報》1981年第4期，頁491–518。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銅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殷墟劉家莊北1046號墓〉。《考古學集刊》第十五集，頁359–388。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鄒衡主編：《天馬 - 曲村（1980-198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

周亞、丁忠明、蘇榮譽：〈子仲姜盤與晉公盤對比研究：以鑄造技術為核心〉，待刊。

周亞：〈晉韋父盤與盤盃組合的相關問題〉。《文物》2004年第2期，頁61-69。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Inheriting and Creating: Studies of *Pan* 盤 Basins Prior to the Mid-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rom the 6<sup>th</sup> century BCE)

SU Rongyu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It was a period of dramatic change between the end of Western Zhou and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bronzes of that time were thought generally to be the lowest recessionary point. Nevertheless, a new high peak for bronze immediately came after it. Unfortunately, the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m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both of art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pan* 盤 Basins, the abundant connotation has been revealed by both new unearthed objects and new means like CT scanning. At first, two tremendous unique *pan* Basins, one made for Zhongjiang 仲姜 and another one made for a princess of State Jin 晉,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both style and technology and then discuss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an* and its changes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focusing on the key elements of style and technology. Although the function of *pan* Basins shows disparities in different times, the masterworks were always produced by virtuoso and ambitious craftsmen who employed enthusiastically new technologies for toy-like bronze making, and one way of creation was returning to the ancients. Certainly, the interruption of style and technology were usually caused by the craftsmen too. There were some luxury masterpieces though the bronzes were rougher from late Western Zhou to middle Spring and Autumn, of course it was not the lowest recessionary point. In addition,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function of *pan* Basins, and analyses the bronze plaything (*nongqi* 弄器) and bronze toys.

**Keywords:** bronze art, bronze technology, interruption, restoring archaism, bronze toy